

目 录

- 明代临清钩沉……………毛佩琦（1）
《金瓶梅》中的临清地名考
……………王连洲（39）
临清城址初考……………徐登阶（70）
临清文化舞台……………王洪辰（72）
吕才与《秦王破阵乐》……………马鲁奎（94）
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碑亭简介
……………卢敏 吕魁隆（100）
悼念五表爷张自忠将军诗二首
……………林 远（106）
忠烈一生 后人之师
——缅怀先烈张自忠将军
……………林 远（107）
将 军 颂……………薛凌贝（108）
王贵笙题画诗六首……………侯朝宪（109）
会通河史略……………崔子良（112）
党恩浩大 永志难忘
——1963年临清抗洪纪实
……………郝修业（118）

- 垂钓小史 崔子良 (129)
临清竹器业的演变 二轻史志办 (133)
知识小品十则 修东海 (138)
文物选萃 殷黎明 (147)

明代临清钩沉

毛佩琦

古今城市的兴起，除政治原因外，经济的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两者无不联系于其时其地的交通条件。所以，城市多在交通路线上，或路边，或河畔，或港口。

明代由于会通河的疏浚，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的临清，随着大运河交通作用的发挥，迅速地繁荣起来。本来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僻小县，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都会，其战略地位也从而提高。这种情况在明代一直没有改变。

清代末期，黄河北徙，运河淤塞，漕运制度也渐行破坏，东南物资兼用商运。迨海运大开，运河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平汉、津浦铁路的开通，南北运输便全被取代。与临清的繁荣相一致，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消失后，临清的繁荣便迅即成了历史的陈迹。

明代的临清号称名城，它的面貌到底怎

样？它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究竟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就史籍所载加以考察。我想，这不仅有助于了解明代临清，而且有助于了解明代社会生活，即对今日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不无借鉴之益吧？本文所述，拟为三题，有关问题，则分别附之。

一、战争要地

临清地处鲁西，位置本不引人注目。临清有县，始于后魏。自隋开永济河，其地遂与运河为邻^①。但隋唐以来废置相寻，统属无定^②。临清地位的提高，始于元朝。元大都（今北京）供给皆仰东南转运。会通河、通惠河开凿，东南财富可经水路直达大都。这样，处于会通河与卫河会合处的临清，一下子便成了水路要冲。临清自然地理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更重要的，则是临清政治地理形势的变化。

元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都于大都，全国政治中心向北转移。山东成为大都的南部屏蔽，是联络河北与江南的纽带，而临清适当其会。元朝末年，田丰、毛贵率起义军扫荡山

东，元政权南北的联系便被切断，南方已无法控制，朱元璋的势力从而得以发展。其后，朱元璋命将北伐，亦先下山东，会师于东昌、临清之境，然后进逼大都。

明朝洪武初，东昌路（今山东聊城市）改为府，隶山东布政司，临清县成为东昌府的属县^③。明朝虽然定都南京，但由于北平曾有辽、金、元相继作陪都或首都，长达四百余年，已经成为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它对控制蒙古和掌握北方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要保证全国统一并向北发展，山东作为南北联系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临清因而为人瞩目。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先后派信国公汤和、西凉侯濮王以及汉、卫、谷、庆、宁、岷诸亲王练兵于临清，并在临清储粮，以给训练之兵^④。朱元璋死后，惯于征战的燕王朱棣拥兵北平，威胁着帝位。建文帝同样把临清作为控驭北方的桥头重镇，曾于建文三年（1399）三月命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⑤。靖难之役，朱棣南下，也以临清、东昌为必争之地。其初，燕师克德州、据临清，谋下济宁，以东昌之败，不得已还师。官军正因在山东取得了胜利而阻

挡了燕军。同样，燕师也正因于建文四年越过这一障碍而驱师徐州。至此，虽有长江天险，也无济于事了。

永乐迁都北京，使政治地理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山东重新处于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财赋之地相联络的纽带地位。大学士丘浚说：北京“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⑥”。永乐九年（1411），会通河疏浚以后，运河成为漕粮的主要运输孔道，临清的地位更行突出。顾炎武认为，山东要塞之地凡五，而临清首当其冲^⑦，就是因为“积贮，天下之大命也”，如有“不逞之徒，乘间窃发，八百里中，泥丸可塞也^⑧”。

明初，临清设有守御千户所。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发生，朝廷以临清为必守之地，“公卿咸议，临清要地即不守则燕蓟不可居，而中原不可保^⑨”。于是派平江侯陈豫出镇临清，并接受陈豫的建议，于景泰元年（1450）调济宁左卫五所来临清，合原驻军为卫^⑩。兵部尚书于谦建议在临清筑城。同年，在巡抚洪瑛与陈豫以及都御史孙曰良主持下，在会通河与卫

河会合处东北方的“闲旷之地”建成了临清城。城以砖甃之，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周九里一百步。有四门，戍楼八，戍铺四十六，匝城凿隍，深广皆九尺^⑪。弘治八年（1495），兵备副使陈璧又增建了临清城的女墙、月城，可谓蔚为壮观了。

但是，临清新城并不紧靠会通河岸，不仅对控扼漕河不便，即其繁胜也因而远逊于二河会合处的中洲。盖会通河在靠近卫河附近分为两支，分别在南北两处流入卫河，因此在会通河与卫河之间形成了一块周围环水的狭长陆地，这就是中洲。临清的真正要害在中洲。大学士丘浚说：

惟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

东控齐青，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⑫

他所说的跨河为城，即在中洲设城。中洲本有土城，为明正德年间筑。中洲为贸易集中

之地，居民繁盛。正德六年（1511），刘六、刘七造反，兵及博平、夏津，陷高唐、武城。朝廷命兵部侍郎陆完驻兵临清加以镇压。兵备副使赵继爵在中洲掘堑筑土以卫城外之民，当时称为边墙，亦称为罗城。嘉靖二十一年，巡抚曾铣根据丘浚跨河为城的建议，将原边墙拓而广之，历时四十有六日，费四万金^⑬。城为土质，延袤二十里，跨汶河（即会通河）、卫河二水。史称“池之深阔，垣之高广，一如砖城，而閈闔之宏丽峻敞实过之^⑭”俗称此城。为玉带城。

成化二十年（1484），朝廷设临清兵备道。由按察副使或佥事，于诸要害处出使一二人以分别掌管不同工作，称道，有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分巡道、整饬兵备道等。兵备道职在理问刑名，操练人马，协同抚按控制一方。当时东昌府，临清高唐二州，聊城、清平、茌平、博平、堂邑、冠、馆陶、邱、夏津、武城、东阿、平阴、阳谷、寿张十四县，平山、东昌、临清三卫以及五个巡检司都受管辖。兵备道所部州佐主警，卫佐主操，百户主牧，有马兵、步兵、卫兵及新军壮勇、守城民兵，总数二千有奇^⑮。

万历二十一年（1593），清临设协镇署，

置参将，崇祯十一年（1638）改为镇，莅以总兵。据州志记载，“临镇原有十三营，共兵一万三千余名”^⑯，大概是驻兵最多的时期。在临清驻扎重兵，除因它的经济、战略地位重要外，还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人口：运军、商民和一大批为漕河服务的人员。诚如明礼部侍郎许成名说：“方贡绎骚，供荐委填，应之非道，民力奚堪！”^⑰一旦失去控制，情形将是十分可怕的。

临清的战略地位，是全国的政治地理形势决定的。这一点明以后也没有改变，李自成起义、太平军北伐、宋景诗、张总愚、义和团甚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诸大事，莫不牵动临清。清乾隆时的王伦起义就在临清。

二、漕运咽喉

国家要维持政治、军事机器的运转，粮饷储积须臾不可缺少，统治阶级的享用开支也是巨大的。元代以后，如何把江南财赋之地的大量物资运输到北方，始终是大问题。不过，元代以海运为主，兼以河运。即使在会通河开凿后，河运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明初，供给辽东、北平军饷仍以海运。永乐迁都北京，粮饷运输逐渐繁重。

但会通河已于洪武二十四年因黄河决口而淤塞。永乐初，用可载重三百石以上的淮船经淮河、沙河抵陈州颍岐口入黄河，运至阳武，转陆运，至卫辉再入卫河，再用可载重二百石以上的浅船运输北上。劳费甚巨。永乐九年（1411），宋礼疏浚会通河。十年，岁以河运百万石，海运则三岁两运。^⑯至永乐十三年，竟罢海运。

据《明史》记载，宋礼建议造浅船二千余艘，以供漕运，开始时岁运二百余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五百万石。^⑰到成化年间，岁运漕粮稳定在四百万石，成为定额，但这数字仅指运赴京通的正粮。实际运京通的漕粮，除例折外，正耗共计五百一十八万九千七百石之多。^⑲

表一

单位：万石

年份 (公元)	永乐 1274	永乐 1316	宣德 1321	正统 1332	景泰 1352	景泰 1357	天顺 1370	成化 1398	以后
漕粮数	50	460	500 余	450	423	292	435		400

资料来源：郑晓《今言》卷三。按此表所列数字与历朝实录所载略有出入。

除此以外，还有江南常、苏、松、嘉、湖

各府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山东、河南粟、米、豆、麦又若干石，不在四百万石之数^{②1}。根据丘浚提供的数字“今日十八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计算，每年经过运河的船只仅漕船一项就达一万只到一万六千只，运军达十万人到十六万人之多^{②2}。这与许多文献所记载的数字是一致的^{②3}。各地漕船至京皆有定限。自三月一日至六月一日之间，从北直隶以至于江南漕船都必须到京，后者罚俸，前者进秩。所以，三月到六月前后是漕河中最繁忙的季节。每年有如此众多船只、人口通过运河，便造成了运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的畸形的繁盛。

临清的特殊之处在于，“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②4}临清实际是一个过路转运站。其表现之一就是临清粮仓的建立。

临清粮仓最早建于洪武六年（1373）十二月，同时派兵三千以戍守之^{②5}。洪武二十四年（1391）五月以诸王练兵临清，又储粮十六万石于兹，以给训练之兵^{②6}。会通河疏浚以后，

大运河成为主要粮道，“以程远物多，因而率五七百里严储峙之区”。沿运河两岸建立徐州、淮安、德州、临清、天津等“水次仓”，以资转运。临清仓，即洪武之旧^{②8}，至宣德中，又增造临清仓，可容漕粮三百万石。^{②9}盖永乐、宣德间漕运曾先后实行支运法。支运，即民运粮就近交纳各仓，再由官军从仓中支取运送至京、通二仓。比如，宣德四年复行支运法，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官军分别就近支取各仓粮运至京、通。支运法使民粮就近入仓交纳，大大节省了劳费。“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③0}这样，各仓就成为吐纳暂存的必要一环，而临清仓在水次五仓中的地位尤为突出。请看下表。

表二

仓址	天津	德州	临清	徐州	淮安
仓名	天津 天津左 天津右	德州 常肆*	临清 广积***	永福 广运	常盈
仓数	3	2	3	2	1
建仓时间	永乐二年 宣德五年 (1404)	永乐四年 广积 (1430)	永乐四年 广积 (1406)	永福洪武 元年(1368) 三年(1415)	永乐十三年 广积永乐十 年(1415)
万历时所存仓库数	18	28	48	4	2

资料来源：明会典卷21户部8

*《天府广记》卷十四：德州仓曰常盈。《明史·食货志》：德州仓曰常丰。

**《永乐实录》十三年六月：移德州之广积仓于临清。

***洪武六年即设仓，称旧仓，见注释。

明户部主事胡尧元的《仓部题名记》说，永乐以后，临清“岁受山东、河南之赋几三十万，以节漕力，以望京储，厥为重哉！”^⑩临清三仓都建于临清砖城未建时，景泰建城后，仓在城内。竟占全城面积四分之一，各仓以军守卫，官给营房，其军原皆方国珍部下，因而

当地人俗称守仓军为“蛮子营”，嘉、万间仍相沿不改。临清、广积二仓俗称大仓，共“寄留备缓急之虞，补缺够京通之数，时给续挽牵之食。”常盈仓俗称小仓，其储“乃有司卫所官吏军旗暨养济月粮米也”。万历时，大仓岁入山东河南并大名州县两税二十万余石，小仓岁入山东州县所供米麦六万余石^⑨。自永乐年间起，政府每年派户部主事一人督理仓务。自宣德至正德，督仓务者共有七十人，其中员外郎九人，主事六十人。宣德至正统，三岁一代，景泰至正德，每岁一人，成为定制。当时称他们的工作是“司内宰之分职，而外方伯之事”^⑩。在临清设有督储分司，作为办公机构，但开始时他们并不管具体仓务，仓务由临清县暨后来的临清州管理，其后由于“军横难制”，仓务逐由户部官直接控制^⑪。三仓还设有大使、副使、攒典数人，斗级数十名，修仓夫二百名，以管理具体事务^⑫。

除此外，自宣德末年，通京各仓始设监督中官，后遍及徐、淮、临、德各仓场^⑬。这些中官往往营私舞弊，骄横无道。成化二十三年（1487），曾下令京通仓并淮安、徐州、临清

水次各仓场内官原设者存留，添设者撤回，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皇帝即位，复起孙交为户部尚书，孙交力主尽罢监督仓场中官，并临、德、徐、淮诸仓一切勿遣。嘉靖尚未有决心全部裁撤，只下令临清仓场监督内臣只留现在二员，着廉静行事，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而已。嘉靖十四年（1535），监督中官王奉、李顺互以奸赃讦奏，下法司按问。给事中管怀理因言：“仓场钱谷，皆户部事。今参用内官，惟肆贪饕，无裨国计，请悉撤回。”于是督理仓场中官才尽行撤回^⑦。

临清除上述三仓外，还有水次仓，在中洲马市街，洪武年间创建，名曰水次兑军仓，又有预备仓，在县东帅府旧址^⑧。

宣德六年（1455），行兑运之法，江南民不再运粮入仓，而是将粮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北上，但支运并不废止。正统初，漕粮四百五十万石，兑运二百八十余石，徐、淮、临、德四仓支运一百七十万石，占十分之三四。成化中岁运额四百万石，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到了成化九年，又将四仓支运七十万石之数全部由运军赴江南水次交

兑，长运至京、通。但，此外仍有交兑不尽者，依旧由民运赴四仓^{③9}。

临德二仓所储预备米，岁入十九万石，其中临清广积仓山东五万四百石，河南六万石，共十一万四百石。积之十年，临清仓可得一百一十万四千石。如果遇有灾荒府分，其应纳之粮可以停免，而于邻近府分照数臻补，候丰年再归还。但如果各府均受灾，无处臻补，那么就动用临清、德州二仓的贮备粮，支运京通，务使漕粮足于四百万石之岁额^{④0}。但是，预备粮储，久无支销，以致陈腐。正德二年(1507)令浙江、江西、湖广三省卫军赴临德等仓每年支运三十五万石^{④1}，以使仓粮更新。

兑运法实行后，运军长运至京，临德诸仓所储渐少，而京通仓则多不能容。于是，临清、德州、河西务仓各废弃三分之一，同时扩大京仓。成化年间，临清城外的预备仓废置不用，而用城内仓库储存预备米。^{④2} 万历时，以临德仓有所储，而徐淮仓无粒米，便规定，临德储足五十万余石，其余存于徐淮二仓。^{④3} 但这时漕粮折银渐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京仅三十八万余石。京军月俸，边军给饷已变为银米兼支。官兵除领得本色

粮米外，仍需以银买米以供消费。是漕运虽减，而消费未减，可以想见，商人贩米的规模是扩大了。天启、崇祯多事之秋，天下萧然烦费，自运河北上物资的实际数量只会扩大。

总之，临清不仅是漕粮的必由之路，而且它的仓场还起着粮食盈亏的调节作用。丰则储，欠则支，一如洞庭湖调节着长江的水量。

临清因为地处运道，便于运输，在明清两代还担负着向北京供给营建所用砖瓦的任务，是重要的砖瓦烧造地之一。自永乐时起，便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分司，派工部侍郎一员管理烧造，提督收放。

临清所烧的砖有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二尺、尺七、尺五、尺二四样凡八号。后来只派造黑白城砖及斧刃砖^④，每年烧砖一百万个左右。北京营建长年不断，烧砖运砖也就成了固定任务。用砖最多的一是永乐，一是嘉靖。嘉靖时，砖料价银向河南、山东二省，北直、南直、安徽、浙江的一些府、州征收，派官解赴临清发给^⑤。

起初，砖料运输全靠运河中官民船只带运。其

制始于洪武时。当时令各处客船量带沿江烧造官砖，于工部交纳。永乐三年（1405）规定，船每百料带砖二十个，沙砖三十个、天顺间，令粮船每只带城砖四十个，民船依照梁头每尺带六个。到嘉靖三年（1524），规定粮船每只带砖九十六个，民船每尺带十个。十四年（1535）更增加到粮船每只带一百十二个，民船每尺带十二个之多。官民商船派带砖料是强制性的，如有损失，还要责令带运者赔偿。但是，也有特许免带砖料的。弘治八年规定，“一应官民马快运粮等船”均应带砖，惟“荐新进鲜黄船”除外^⑯，盖为保障皇帝享用也。此外还有雇船带砖的办法。永乐时曾命河南、山东、直隶各处巡抚督金所属军卫、递砖所等，量起人夫，措置车船，由窑运至存放场所，官府给以适当脚价。嘉靖四年，则命令临清砖料顺带未完者雇船运解，其脚价由各司、府、州、县推出。砖料所过地方还要应付夫麋^⑰。运砖成为运河上运军商民的沉重负担，成为无法逃脱的额外差役。张瀚在《暂免运砖以恤运军疏》中说：“粮运带砖，始于一时权宜，今已遵行年久……往运河渠通利，加带不胜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

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驯至载重难行。”因此他要求暂免运砖^④。然而这种呼吁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同样，造砖也成为临清等地军民的沉重负担。在烧造中，营缮分司官将烧造委诸从吏、军尉。这些人从中刁难窑工，苛索贿赂，以致“估溢而器不精”，“作业剧而费不偿”。

“财诎于县官，而赔出于陶人”。因而“公私交病^⑤”。尽管有清官干员力行整饬，其基本负担也是难于免除的。另外，烧砖需用大量的柴薪，这便使临清和附近东昌府所属诸县，柴薪短缺，价格高昂，成为当地军民的又一困难^⑥。

丘浚说：“会通一河，譬则人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而立有死亡之祸^⑦。”漕运粮道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万历年间，仓场侍郎赵世卿针对当时漕粮减少的情况说：“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衍期，不复有京师矣^⑧。”粮储断则京师不存并非恫吓之语。

既然如此，明朝对于运河漕路是十分重视的，而临清则为漕路之关键所在。会通河是一

项了不起的水利工程，宋礼筑坝，遏汶水等水，加大了会通河的流量，从而使其运载量大大超过元代。自南旺至临清地隆九十尺，其间置闸十七座以控制水位。为了保证运路的畅通，政府设有专官管理。自瓜州、仪真至通州河道皆属漕抚兼理，下设郎中二员，分南北专理之。各洪、闸又各有主事一员负责^③。修理洪闸、疏浚河道，建筑堤防，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同样给沿河人民带来极大负担。谢肇浙《挑河行》写道：

堤逶迤，河弥弥，分水插前人如蚁。鹑衣短发行且僵，尽是六郡良家子。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九人趾欲断。……五百词犹可，里胥怒杀我。无钱水中居，有钱立道左。……道旁湿草炊无烟，水面浮冰割人膝……君不见会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尽官夫手^④。

正是当年挑河工地的生动记录。

大运河既是一条经济命脉，又象一条难以摆脱的绞索。它缠绕着庞大的帝国，缠绕着千百万军民。数百年来多少治世能臣为之殚精竭力，多少沿岸军民为之流血流汗。究其所始在于自明代永乐以后罢弃海运，专赖河运。

其初，永乐五年，有人上言：“北京军饷

河运不能给，须兼海运”。 “请于太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择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干者充使，行移如布政使司，提调各卫所海船，并出海官兵”，看来当时不仅有海船，而且有出海官兵，可供运输。但是朱棣根本不同意这一建议，“令再议^⑤”。其后，宋礼上言，海道险远，运船多有损坏漂没。他说：“计海船一艘，用百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艘二十船，用百十人而运千石”，“其费可办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运千石”利病较然”云云^⑥。但这一估计仅仅是机械地计算，而未顾及长远的得失。元人的海运，清朝末年的海运都证明海运不仅可行，而且其损失远远低于河运，费用也远远小于河运。^⑦以朱棣之雄才，可以派大规模船队远航西洋，而不能解决近海漕运问题，不亦很奇怪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朱棣好大喜功而少重实效于此又见一例。专赖河运不能不说这是明代君臣的一项重大失误。

三、商业都会

会通河疏浚后，漕粮贡赋以外，大量商品通过运河南下北上，成为南北重要商路。

首先，官府允许漕运军人船只附载自己的货物。洪熙元年（1425）的一道敕谕说：“官军运粮，道远勤劳，寒暑暴露，昼夜不息，既有盘浅之貿，粮耗米折所司又责其赔补，朕甚悯之。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挡。”正统三年（1438）又重申：“顺带土货以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人等生事阻挡。”^⑤对于漕船所带之货，各钞关免征税钞。弘治时，每船带物限十石，到万历时则至六十石之多^⑥。以前述漕船约一万二千只计，则弘治时漕船所带土产约为十二万石，万历时则多至七十二万石。实际的数字可能要多于上述估计，因为免税带货是有利可图的。

其次是有大批商船往来于漕河之上。这从明代于临清所征的大量船料商税可以看出。《明史·食货志》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繁。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费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⑦洪武时规定，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似有保护商民之意。至于朱棣，则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⑧则在企图限制商品经济发展了。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抚陈济言：“淮安、

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②。”朱棣批准了这一建议。税有定额，虽便监督，但定额长期不变，往往脱离实际，反映封建统治者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临清正式设关征税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当时，在各商贾辏集之地设钞关凡七所：

三
冊

资料来源：《明会典》卷三十五等。

宣德四年（1429）规定。各钞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钞。“……惟装载自己米粮薪刍及纳官物者免其纳钞^⑬。”临清、杭州除征收船料钞外，还要兼征商税^⑭。但后来，各钞关都是船料钞、商税兼收^⑮。所谓船料，是船只大小的一种计算单位。比如，遮洋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规定，每船百料收钞一百贯。景泰时减至十五贯。至成化时，因为船料难于核定，依船头广狭为收税根据。其税钞钱中半兼收。后来也有每岁本折轮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者^⑯。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发卖者，照旧全税。在四外各地发卖者，临清先税二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卸卖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即发红单注明某处发卖，给商执至河西务、崇文门外，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⑰。其所榷本色钱钞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弘治六年（1493）令河西务、苏州、九江、临清钱粮多处，户部各差官一员；淮安、扬州、杭州钱粮少处，南京户部各差官一员，俱一年一更，以专门管理钞关榷税。现将各钞关历年

船料商税收入列表如下：

表四

单位：银，两；钞，贯；钱，文

年代	项	目	河西务	临清	济宁	九江	杭州	淮安	扬州	泰州	崇明	余	资料来源	
													明会典三十五户二二。	
靖 嘉 崇 1517年	漕	料牙税	船料商税	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税正余	余	
靖 嘉 崇 1517年	119万余	1260万余	586万余	293万余	余	190万余	300万余	169万余	余	169万余	余	余		
靖 嘉 崇 1517年	4000余	4000余	4000余	4000余	余									
靖 嘉 崇 1517年	14900余	14900余	14900余	14900余	余									
靖 嘉 崇 1517年	83800余	39900余	15000余	39800余	余	22700余	1290余	余	(无商税)	(无商税)	(无商税)	(无商税)		
靖 嘉 崇 1517年	2520万余	1173万余	689万余	381万余	余	6000万余	38万余	38万余	余	38万余	余	余		
万历以前	旧额银	46000	83800	45000	25000	余	40000	23000	13000	68929				
天启元年	新增银			22500	(天启二年)	12500余	20000	7600	2600					
天启五年	新增银				20000	20000	20000	15000	10000	20000	户			
崇祯二年	合计	(议减) 10000	(议减) 20000	87500	57500	80000	45600	25600	88929					
				36000	63800									

*此资料原来未注明年代，其中无上新河、济宁、徐州、金沙州诸关，因为这些关已经废置，考上新沙关废置年代最晚，在嘉靖六年以后的。

从上表可以看出，临清的商业地位是很突出的。即使在船料商税银议减之后，数字仍然很可观，仅在苏州、杭州、崇文门之下。万历六年，山东一省税课折银只八千八百六十两。仅及临清一州的十分之一稍多^⑬。

宣德十年，朝廷在临清设立户部榷税分司。以督理关税，以御史或郡佐（通判等官）充任专职。正统及成化间曾两次罢废不置，景泰初及弘治又两次恢复。于是，每岁出户部主事一人，督理船料商税，具体收税的是临清会通税课局，而以州印票防之。所收分季解京，以充内帑^⑭。万历以后，朝廷命户部贵州清吏司带管在京各衙门仓及各边镇关钞^⑮。

如此大量的商税收入，刺激着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弘治中，倪岳上疏说当时：

“改委户部官员出理其事。其间胥否不齐。往往以增课为能事，以严刻为风力，筹算至骨，不遗锱铢。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诛求。船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动科罚。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富，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稍有不从，轻者重加笞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船只号哭水次……其科罚者……率皆借名入己，……此等官既出部委……是以肆无忌惮”。^⑯

看来，乱罚款，乱摊派，乱征求资助的事明中期已然，这是妨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股封建势力，自隆庆以后，“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②”，万历时，两宫三殿灾，营建不资，开始增设矿税，于是，百税杂出，征税中官遍布天下，临清是被害地之一。

万历二十七年，中官马堂、陈增因争夺在山东征税的地盘而发生冲突。万历皇帝为之和解，命马堂征税临清，陈增征税东昌。马堂始至临清，诸亡命从之者数百人，白昼锒铛夺人产，抗者辄坐以违禁之罪。仆告主者，给以所告的十分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远近为之罢市。州民万余纵火焚烧马堂署邸，击毙其党羽三十七人。织筐夫王朝佐，慨然承担责任，以免众人之难^③。当时舆论认为王朝佐应从宽处理，但巡按张大谟、抚臣刘易从、道臣马怡，都与马堂同党，遂列王朝佐罪状加以杀害。矿盐税使的劣迹是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丑恶的集中表现。马堂是它的代表之一。王朝佐则成为千载传颂的英雄。其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正在北上京师途中，他曾从时人的口中

听到这场壮烈的斗争⁷⁴。征税宦官对各地商业的破坏是空前的。当时记载，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由于税使的横征暴敛，使商旅裹足不前，商税急剧减少。请看下表所列各关所征钞税减少情况：

表五

单位：两

年分	万历二十五年 (1597)	万历二十七年 (1599)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万历二十九年 (1601)
税额	417500	340549	306132	292800
百分比	100	81.57	73.33	62.99

资料来源：《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在临清关，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资本尽折，独存两人。临清向来缎店三十二座，闭门二十一家，仅余十一座。布店七十三座，闭门四十五家，仅余二十八座。杂货店六十五座，闭门四十一家，仅余二十四座⁷⁵。自税使四出，“虽平昔富庶繁丽

之乡，皆成凋敝^④。”这种情况，只是在万历皇帝死后才稍有好转。

商业给临清带来了繁盛。本来，山东地广民稀。明初曾移山西泽潞二州之民往临清等地。会通河疏浚后，临清为“漕挽之喉，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商旅出乎其途^⑤。”作为商业都会，临清不仅“冠于济西”。而且在全国也有相当地位，利玛窦称其为“著名的港口^⑥”。

小说《金瓶梅词话》曾写到，来保“往临清马头上，将封寄店内布货，尽行卖了八百两银子”。又写到，“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⑦可见，临清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大量的人口集中于临清，本地所产粮食不敷用，必须靠商人贩入。根据各种书的记载，临清的市场上除粮食、布匹外还有棉花、丝绸、瓷器、皮毛、铁锅、梨、枣等等。

临清最繁华的地方在中洲，即会通河、卫河二水会合处，周围环水之地也。李东阳《咏

鳌头矶》诗说：“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⑧0}。正所谓“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虽无名山之观，而亦非僻壤可比也”^{⑧1}。所以，当时有人说，虽然身在临清，而“居人只说是苏州”^{⑧2}。临清的缎店、布店、杂货店已如前所述。其桥梁、庙宇也装点了它的繁盛。临清地域并不大，但仅见于文献记载的明代桥梁就有永济、问津、广积、狮子、宏济、通济、米公以及浮桥八座、渡口八处。庙宇则包括释、道、回教，仅明代的就有二十三处之多。城隍、社稷、先农、文昌以及乡区小庙、各种杂神庙均不计在内。

临清的繁盛，使得“四乡之人就食日滋”^{⑧3}，人口迅速增加。据康熙《临清州志》记载，洪武时临清县只有一千五百二户，八千三百五十六口。万历二十八年迅速增至三万三百二十三户，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口。崇祯十三年有丁达六万三千八百一十九人，后因战乱逃亡五万三千一百七十，所余尚一万六百有奇^{⑧4}。这是

指固定人户。此外，“四方商贾多于居民者十倍。”^⑥由于临清地位的重要和人口的增加，弘治二年（1489）从巡抚山东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钱钺和巡按监察御史尚翀之请，升临清县为州，“改附官制，增长官属，悉如全设上州事例”。上隶东昌府、下辖馆陶、邱县二县^⑦。

临清的民风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逐渐远离了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请看旧志中对临清民风的描写：

质直怀义，有古风烈。（隋志）

士风彬彬，贤良宏博。（博平旧志）

其民朴厚，好稼穡，务蚕织。（元濮州志）

俗尚敦厚，家知礼教。（元志）

士商皆儒，人多读书。（同上）^⑧

再看看明至清初期间的情况：

舟车毕集，财货萃止，衣冠胜于文物，俗近奢华而有礼，士奇功名而有学。崇信礼让，重廉耻，不好健讼。而服贾之民恒居十之六七。（州志）^⑨

吾清以奢士尚，逐末者十室而九。^⑩

兖东三郡，濒河招商，舟车凑集，民习奢华，其俗也

文若胜乎质。^⑧

盖此地五方走集，四民杂处，商贾辐辏，士女嬉游，故户列珠玑，家陈歌舞。饮食靡乐，极耳目之欢。至于本境人民逐末者多，力本者少。^⑨

乃民贫而俗尚不易，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岂独外腴中枯已乎？^⑩

相反，离临清仅数十百里的周围州县，其民风相对说来没有什么变化。

民务耕稼，土习诗书，节俭之风自古而存。（夏津）

士谦顽朴野，百姓务稼穑。（邱县）

民朴实，无浮华。（馆陶）

朴厚而茂，有秉心塞渊之旧俗。（冀州）

俗近朴约。（清平）^⑪

可见，商业经济对农业社会的冲击是十分猛烈的。

经济的发展还为临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大学士李东阳说：国家定鼎北方，百年于兹，文轨玉昂与弦诵之声日益月盛，固人材之渊薮也。^⑫”礼部尚书王崇庆说：“吾见是地，有衣冠人物之盛，有甲科先后之继，有商贾辐辏之繁，蔚乎盛矣。”^⑬学士张元祯说：

“兹州天下重镇，密迩京师，玉帛万国，舟车攸萃，而文化沾被，视他邦为先。”^{⑤6}由于地理之便，经济的发展给临清带来了大量的财富。有了财富，则会有文化，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临清的兴盛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和明代的漕运政策。清朝统一全国后，仍然采用明代的漕运制度，东南财赋仍然大量从大运河北上。因而临清的繁荣有增无减。乾隆四十一年，临清由州升为直隶州，再次在政治上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咸丰五年，黄河北徙，截断汶流，运道阻塞，漕粮多由海运，同时，官办漕运行之既久，弊病百出，制度尽坏，反不及商运省钱省力。于是官办漕运逐渐为商办（包括洋商用火轮）海运所取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河运便完全停止了。会通河堤岸埝道都成了纳租良田。及平汉、津浦铁路修通，会通河作为运道的作用完全消失了。

临清随会通的开凿而兴起，随漕运、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运道之不存，临清亦迅即衰落。临清作为古代经济名城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然而临清的繁盛为什么不能维持？究其原

因，其繁盛完全由于外部条件所促成。其本地既无特产，其百姓又少特别技艺。四方就食之民差不多都是为运道服务，赖运道而生存，它们始终处在被运道这一外在条件所左右的地位。临清的繁盛并非自身的繁盛，而是运道的繁盛，漕运的繁盛，一旦这个外部条件消失，临清的繁盛便迅即消失。临清的兴衰，不亦可以作为今天发展城市经济的一种借鉴吗？

【注】

① 《通志》卷三炀帝到上。

② 万安等《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四：“后魏太和间于县（指今清渊县）西四十里置临清县，属魏州，北齐废，隋初复置，属贝州。大业初属清河郡，后属贝州，大历中属瀛州，又析置永济县。宋初，以永济省入临清。后废为镇，寻复置，属大名府。金属恩州，元属濮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同。

③ 康熙《临清州志》卷一建置。《明史》卷四十一地理二同。

④ 《明太祖实录》十二年二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年五月。

⑤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⑥ 张岱《西湖闻见录》卷六十五。

⑦ ⑧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五山东，形势。

⑨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山东五，临清州。

⑩ 民国《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引《东昌志》。

⑩ 《临清县志》第十册艺文，工部郎中王良柱《重修临清卫记》。《明史》卷六十六，兵二：“兗州左护卫，后为临清卫。”

⑪ 《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临清州志》卷四，王直《临清建城记》。

⑫ 《明经世文卷》卷七十一，《漕运河道议》。

⑬ 《临清县志》第十一册艺文，方元煥《创建土城记》。

⑭ 《临清州志》卷一，城池。

⑮ 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卷十兵防。

⑯ 《榆清州志》卷三，兵防。

⑰ 《临清州志》卷四，艺文，许成名《兵备题名记》。

⑱ ⑲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宋礼传》。

⑳ 《明史》卷一百五十三，《陈瑄传》。按，《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载：“平江府陈瑄纳之，舶增至三千余艘，……可三百万余石。”龙文彬《明会要》引《食货志》则为“可五百万石”。《明宣宗实录》五年六月，“运河转输漕粮达五百万石”。

㉑ 万历《明会典》卷二十七，户部十四。《明经世文编》卷四十，马昂《会议漕运事宜》，李东阳《重修通州新城记》。

㉒ ㉓ 郑晓《今言》卷三，卷二。

㉔ 《明经事文编》卷七十一，丘浚《漕挽事宜》。

㉕ 查慎行《人海记》卷下：“景泰以前，漕船无定数，天顺以后，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只，官军十二万一千五百余员名。至崇祯中，额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只，米四百万石，每舟正米三百三十石，每石加耗米九石八斗。”（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又万历《明会典》卷二十

七，嘉靖时浅船为一万二千一百余只，《天府广记》卷十四，军旗十二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名，每船十人，一人正米三十七石。《明史·食货志》略同。《隆庆实录》六年十一月，漕船缩减为万只上下。

②4 王直：《临清建城记》，《县志》第十一册，艺文。

②5 《明太祖实录》洪武六年十二月己亥。《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

②6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五月戊戌。

②7③4 《临清县志》第十二册艺文，阎闇《修理三仓记》。

②8③0③9④1④2④3⑤2⑤3 《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

②9 《明宣宗实录》宣德六年九月，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四，仓场。《明史》卷七十九同。

③1③3 《临清州志》卷四，艺文，胡亮元《仓部题名记》。

③2 《修理三仓记》。按，《临清州志》卷一职官五：广积，临清二仓，岁额河南、山东诸府米“本折旧贮常百万”。常盈仓“岁额济南诸府麦米五万石有奇，为临清任城卫俸，旗军孤老粮”。数字不同。

③3 《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天顺七年奏准……山东东昌府临清仓存留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攒典一名，斗级二十名。临清广积仓存留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攒典二名，斗级三十名。二仓共存留修仓夫匠二百名。”

③4 《明会典》卷二十一，户部八。《明史》卷十七，世宗本纪一；卷一百九十四孙交传。

③5 《临清县志》第三册，建置。按，水次仓或为宣德七年以后建。《明会典》卷二十七：宣德七年，会官军运粮，各于附近水次交兑。

③6 《明会典》卷二十七，户部十四；陈仁锡《皇明世法

录》卷五十四。

- ④⑤⑥⑦ 《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工部十。
- ⑧ 《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张元渊先生台省疏。
- ⑨ 《临清县志》第十一册，艺文，于慎行《司空大夫刘君陶政记》。
- ⑩ 《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税，附临砖。
- ⑪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三引《海运论》。
- ⑫⑬⑯ 《天府广记》卷十四。
- ⑭ 《临清县志》第十三册，艺文。
- ⑮ 《畿辅通志》卷一百五、一百六。
- ⑯⑰⑱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 ⑲ 《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十月甲戌。
- ⑳⑳⑳ 《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
- ㉑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按，明徐复祚《花当阁从谈》：“钞关、临清、河西务、济墅、九江、淮安、扬州、杭州、金沙州，内惟河西务、杭州、金沙州税货，余止税船料。……惟临清税货亦税船。”与此说稍异。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
- ㉒ 《临清县志》第八册，秩官志附。
- ㉓ 《明会典》卷十四，户部一。
- ㉔ 《明经世文编》卷七十八，倪岳《会议灾异陈言》，《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六，“倪文毅居日”，大意相近。
- ㉕ 《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
- ㉖㉗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一章。
- ㉘ 《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
- ㉙ 《谢肇浙》《五杂俎》卷四。
- ㉚㉛ 王俊《临清直隶州志序》（乾隆十四年）

- ⑦9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一回。
- ⑧0 《临清州志》卷四，艺文。
- ⑧1 于睿明《临清州志序》（康熙十二年癸丑五年仲夏）
- ⑧2 《临清州志》卷四，艺文，秦祐《大悲寺》诗。
- ⑧3 《临清县志》第十一册，艺文，程敏政《东义冢记》。
- ⑧4 《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 ⑧5 《临清县志》第十一册，穆孔屏《蓄锐亭记》。
- ⑧6 《临清州志》卷四，王筠《临清州治记》。
- ⑧7 万安等《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四。
- ⑧8⑨3 光绪《山东通志》卷四十，聊城志第三，风俗。
- ⑨0 《临清县志》第十二册，艺文，胡悉宁《豁免土税碑记》（康熙二十五年）。
- ⑨1 贺玉昌《临清州志序》（康熙十二年）。
- ⑨2 《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李东阳《修孔子庙记》。
- ⑨3 同上，王崇庆《修庙学记》。
- ⑨4 同上，张元祖《儒学新修记》。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金瓶梅》中的临清地名考

王 连 洲

一部现实主义著作总是它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就写作上讲也必然选择一定的典型地理环境为依托。《金瓶梅》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选择的典型地理环境是什么地方呢？一百回书中就出现了清河、临清、阳谷、东平、徐州、扬州、苏州、杭州、南京、湖州、严州、湖广、泰安、开封、枣强等约二十座城市，加上城市中的街巷、河桥、码头、关闸、市场、楼坊和一些不够具体的地方名字约有百处之多，初看之下，真令人觉得头绪杂沓、难寻端倪。如果我们把这些名字集合在一起进行认真分析后，就不难看出两个明显特点：其一是小说本事是发生在清河县城，而主要场景却是写与清河毗邻的临清。除书中多处直接提及临清外，在书中出现的城区细部地名也以临清为最密集，景物描写也最具体。其它地名则呈星散状态，大多未做详尽描述或是一笔带过。其二

是这些城市与具体地名多与明代运河的漕运及因漕运发达起来的商业繁荣密不可分，有血肉联系。换言之，《金瓶梅》描述的故事是以运河漕运孕育的明代城市的商业繁荣为背景的。蔡国良先生在《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商业》一文中说：“由于商品交换，从南到北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运河沿岸的临清就是这样沟通南北商品的重要城市”。他接着引述山东巡抚陈济的话：“淮安、济宁、东昌、临清、直结商贩所聚”（《明史·食货志》），故而“临清多大贾”，“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滞鬻其中，率非其地所出。”（《古今图书集成》卷二五五）。显然蔡先生已注意到临清这座运河城市对于《金瓶梅》成书的重要性。就连主张作者不是山东人而是江苏太仓王世贞的朱星先生也说道：“清河县、临清码头等地都写得很具体”。这也客观上承认了清河、临清在书中的特殊地位。尽管临清在书中随时出现，不知是什么原因却至今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为对研究尽点微力，现对《金瓶梅》一书中出现的部分临清地名作些考证。为使叙述方便，把这些地名分为几组去考释。

一组 临清与清河

《词话》本26回写：“来旺随着两个公人哭哭啼啼从四月初旬离开了清河县”。另外又写由清河“出城门，径到临清码头晏公庙来，有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庙天色已晚。”

按：“清河，明代为县治。元属大名路。从明洪武六年改属于中书省（京都）广平府”。其东有卫河（《明史》897——898页）。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置清河郡临清属之。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地斥境，乃分十三部，置刺史”。冀州刺史部清河郡治下厝县、贝丘县、清渊县皆在现临清版图内，厝县在临清东十五里处，汉安帝时，移城北，更名为甘陵。贝丘在今城东南十五里近古村，尚有古城遗迹。清渊在城西南四十里，北魏移治清水堡，改属冀州部魏郡。（见《临清文史·第一辑》二页）清河曾因东汉安帝（刘祜）为清河王，入继大统后受封为国，尊其母耿氏为孝德皇元妃、甘陵大贵人，今河北临西县简庄有耿贵人墓。

临清：三国时，魏文帝黄初元年隶于冀州清河郡。西晋武帝泰始元年，临清隶于冀州部清河国。自后赵建平元年改名临清县，后，隋

朝又属冀州部之清河郡。唐代贞元之末曾隶属于贝州清河郡，以后多次改属。至明洪武间隶属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弘治二年升为州，辖二县（馆陶、邱县）。（康熙十一年《临清州志·建置沿革》）城址：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复置临清县。城址在今临西仓上村东，当地称为旧县集，距今临清市西三十五里。南宋高宗建炎元年，

（当时县属女真族治内）因水患移城于曹仁镇，即今城南旧县村。明洪武二年迁至中洲纸马巷，今福德街南楼上有县治遗址石刻。景泰元年平江侯陈豫筹建砖城，县址迁城内，嘉靖二十一年（1542）巡抚都御史曾铣跨汶卫二水建新城，俗称玉带城，砖城与新城方圆共29里。（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城池》）

两县的名称均由卫河得名。《战国策》：“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即指此河，于是两县一名清河，一名清渊、清泉、临清。

以上为清河、临清的沿革与城市史。从这些资料可导出以下结论：

1、临清与清河都有悠久的历史。名字同以卫河而起，临清曾在几个朝代置于清河治下，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

讲，说清河也泛指临清，说临清也要想到清河。

2、两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清河由古代的封国、郡县而降为县。临清却由县升为州。盖因清河土地贫瘠，地势低洼，大水漫漶而日趋衰落。而明代的临清却在得天独厚的享用运河漕运之利的条件下空前发达起来。

3、在地理位置上，两县隔河毗邻，清河在西北，临清在东南，相距五十里，习惯说六十里，比《金瓶梅》的叙述少了十里，这可能是由于城址变迁，里制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4、现在的临清市属于山东省聊城地区，清河县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治下。

总之临清与清河两座城市是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它们就是《金瓶梅》书中所写的临清与清河，这应该是勿庸置疑的事实。另一个问题是，从明代史考查，临清与清河城市的发展已有天壤之别，只有商业、手工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临清才是产生一部伟大现实小说的典型地理环境，而处于衰落中的清河似不可能。作者因两城源远流长的紧密联系，并因取材于《水浒》的清河，才用了移植的手法，名写清河而

实写临清。这就出现了把许多临清的地名置于清河县城去写，造成“二清”混淆难辨的情况。这正如吴晗先生说的明写开封实写北京一样。

二组 运河、马头、广济闸桥、“二闸”、临清闸、新河口

93回：“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王老到了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

92回：杨大郎跟着陈敬济“前往临清码头上寻缺货去”，“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81回：“正月初十起身，一路无词，一日到临清闸上。”“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地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涌贵……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月娘不放心，使经济骑上头口，往河上寻舟去了……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往临清县城里来。”

这几回中提到了流经临清的运河，设在运

河岸的码头、桥闸，并具体写出了运河码头一带的繁华。从文中人物活动的路线，还可判断这组地名的相对位置，逐一考证于下：

运河：运河在临清的形势是：卫河由南往北，流经城市西部；汶河（又名会通河）由东往西，流入城区，自鳌头矶分为南北二支横穿城区，与卫河交汇后北流至海。故在临清段的卫河又称卫运河。卫河，战国时称清河，隋大业四年春，循此河往北开永济渠，导河南卫辉县苏门山百门泉，引淇、洹、漳诸水汇集之，以利军运之需，赐名御河。到南宋时，此河大部湮没。元代建都大都，由于运输南方粮食与物质的需要，和避免“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有”的海运艰难，必须重新疏通运河航道。为缩短漕运里程，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由礼部尚书张孔孙等自安民山西南开河，由寿张西北，经东昌、临清引汶绝济，直属漳卫，以转漕。河成，赐名‘会通河’”（《临清县志》），沟通了济宁到临清的航道。这一新的运河路线比隋代运河路线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在临清城区内，这一次开挖成会通河北支。元至元三十年（1293），在河上建

会通、临清二闸。至明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会通河随被淤塞。因洪武、建文建都于南京，不需漕粮北运，弃置未修，到明成祖建都北京，为沟通政治中心北京与财赋主要来源江南的联系，才重新开会通河。这次开河由工部尚书宋礼任事，从永乐九年开始到永乐十三年结束，用了五年的时间。（见《明史·河渠》）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在临清城区的会通河，即现在鳌头矶以北的北支，水流湍急，“中缩而尾回，数环舟”不能利用，“乃于永乐十五年（1417）开凿南河，即现鳌头矶经二闸口到头闸口入卫河的一支，自兹以后，河运通行”。河上设新开、南板二闸。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应指元代在会通河北支修的会通、临清二闸，而应是会通河南支的新开、南板二闸。康熙十一年《临清州志》载，大学士徐溥《会通东闸记》就说“永乐河初行漕法”。现今此二闸尚有较完整的遗存。南板闸在东夹道街南端，会通南支入卫河处，俗称头闸口，新开闸在今车营街北部，青年桥南约三百米处，俗称二闸口。

新河口即指南支的南板闸入卫河的河口处。在这个河口旁，正有一处钞关，叫南水关，《金瓶梅》中说：“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往临清县城里来。”这个行船路线，完全与实际地理相符。

临清闸指元至元三十年在会通河北支入卫河口处建的“临清”闸，此闸在明永乐弘治间相继重修，但因该河淤塞，不利用，终于湮废，其遗址尚可辨清。（即后世修的月径桥处）另一处会通闸处，后来改建为会通桥，尚存遗迹。

临清码头：经查在临清城区卫运河东岸，有三元阁、狮子桥、临清闸等几个卸货码头，其中三元阁码头现有残存的遗迹，其它码头在治河筑堤中湮没，书中所说码头即指偏北的临清闸处之码头，南距广济桥约300米。“王老到了码头上，过了广济闸大桥，见无数舟船，停泊在河下。”走向当是向南。

广济闸桥：即今所谓浮桥口处，在竹竿巷（亦名果子巷）西端。志载：此桥东西横跨卫河，为河西通河东之要津，明弘治时副使陈璧创建。清乾隆时为临清八景之一，“官桥晓月”即指此桥，“乾隆时毁于兵燹”。

由于明永乐间，开挖了会通河南支，才正式使南北大运河这条运输大动脉得以畅行无阻。明清两代数百年中，每年在此河通行的漕船数以万计，俗称为一百二十八帮。（每帮船队约漕船百只）。每年货运量仅漕粮一项达四百万石以上。故城内设广积、临清、常盈三仓，贮官粮数十万石。运河的通航，对明代的经济与文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临清这座城市是收漕运之利最大的城市。它不是一般的漕运过境的城市，而是运河中的大站。南来的仓粮多在此卸货转运并往山东河南等地分配。商船和随漕船带来的物资，如淮盐杭缎、景德镇瓷、绍兴南酒、金华火腿、板鸭与金华酒、云贵药材等均在临清码头上货卖。官船携带的私货则在此卖完后方再北行。回程带来的是天津进口的煤油、火柴等杂货。焦作的煤，南方的毛竹多由卫河来到临清。当地则主要以棉、麦、皮等农村产品输送外地。临清窑户产的大量砖亦靠运河经天津、转运北京。这使临清成为南北物资交换的最大集散地。明代的临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空前的发达起来。兹节引贺王昌《题清源》诗如下：

- 1、名区东郡首清源，水陆交冲市井喧。
翠羽明珠多大贾，奇花怪石有名园。
- 2、千帆寒影落平沙，烟火沿堤几万家。
富商善向红楼醉，豪客惊看白日斜。

大学士李东阳有《鳌头矶》二首道是：

- 1、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 2、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舶来。

这些诗文形象地刻画出明清之际，临清因运河之利而达到的鼎盛繁华，是超出今人想象的。同时也使人看出与《金瓶梅》所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这是何等的一致。

三组 狮子街与灯市、大酒店、勾栏 后巷

《金瓶梅》14回：“花子虚买了狮子街一所房子居住”。39回写西门庆替王六儿在“狮子街石桥东边使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买了一所门面”。15回写吴月娘等坐轿来到狮子街灯市。

14回写吴月娘对李瓶儿说：“只说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市，好不热闹”。吴月娘等搭扶定楼窗往下观看，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接着对五光十色，交相争辉的各种华灯作了详尽的描绘，真个令人产生眼花缭乱、目不暇拾之感。

这条狮子街是在临清城什么地方呢？它的来历怎样？民国二十三年临清县志载：位于“卫河北岸”。再对照一下民国间临清城地图就更清楚，它位于三元阁之北。在此处，卫运河之流向为折向西北。狮子街顺河而建，是一条东南西北方向的大街，实际在河东北岸，笼统地说就是在卫河北岸了，现在临清市青年路西端卫河岸是明清狮子街的北端位置。康熙《临清州志·孝义王勋》名下记道：“官巡抚、好义喜施。先是临清诸街，水道咸汇。大寺门前，居民受患者不下千余家。隆庆元年，勋独捐资，力修沟渠，建石桥于卫河东岸，名狮子桥，至今赖之，有碑文载其事云”。这座桥建在城内通卫河的排水沟口上。狮子街也就是因桥取名。现在青年路西端水塔

稍西处堤内尚可指出此桥遗址。狮子街南端往南约二里处是南支会通河口。此街面对运河背靠新城，地处全城之闹区，自然是热闹非凡了。

对于灯市，康熙《州志·风俗》篇下写道：“上元作市，棚结彩，下缀华灯，灯有锦绡宝料褚革诸色，绘画花鸟，鳞骑以相胜。市民、田竖，朝游夕饮，为留连之会者三日始罢。”民国《临清县志·礼俗志三》记述更详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佳节，街市及庙宇皆悬灯三日，其灯以绢为之，彩绘精美，各项社伙，彻夜游行，鱼龙漫衍，极一时之盛。先期在雪花桥侧有灯市，市上花炮纷陈，各种纸灯，殊形谲制，尤呈异采。自军兴以后，此风已熄，然歌舞升平，回首如昨日也。”此处描绘的灯市，与《金瓶梅》写的灯市有什么两样呢？有人论证书中对狮子街灯市的描写抄袭《水浒传》33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我不反对此议。不过，这并不说明作者缺乏写作灯市的素材，而只能抄袭。恰恰相反，他是把从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临清狮子街灯市，套用上描绘灯市的成功模式，只为把灯市情景写得愈加精彩而已。书中有几处写谢家

大酒楼的文字。酒楼位于河下码头上，“面里有百十个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干，就紧靠着山岗，前临官河，极是个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93回），在98回中又写陈敬济将店主告了，“把大酒楼夺过来，”委托主管，重新开张。临清河下码头上又是否有这么一座面临官河，背靠山岗的大酒楼呢？深知临清史的郑世荣先生告诉我在狮子桥侧，曾有座望河楼。我又访问了八十七岁的李占魁，他说：“在狮子桥西北不远处，有一座三间两层面对西河的楼，位于卫河东岸半腰处。这楼有绿栏干和红窗子。记的约毁六十年了。这叙述应是可靠的。此楼就是面临运河（又名御河，即官河），其东就是龙山。这座山是明永乐间开会通南支时积土而成，其后每年挖河，将淤泥聚积其上，逐年形成了南北长数里，高达五六丈的人造土山。山上树木繁茂，庙宇严整。清初，“土山晚眺”是临清十景之一，就指此山。这大概就是二三百年前谢家酒楼，在历代维修中留下的遗存。至于是否当年叫做谢家酒楼，则不可考。

勾栏后巷是个不太具体的地名，意即妓院后面的一条巷子。这个地名是在书中71回提到

的。94回写刘二“专一在码头上开娼店”；92回写的管弦楼均指女子卖艺卖身的地方。明、清、民国间，在临清这个“多大贾，达官要人递临”的商业畸形发展的城市中，妓院、勾栏妓女一直存在着，尤其盛于明清两代。京剧《陈三两爬堂》中的名妓陈三两，就是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德知府李本固的姐姐，后因祸栖身于临清竹竿巷富春院的。民国期间，妓院有数十家、妓女几百名，较大的有杨家班、郭家班、蒋家班、何家班等（见临清地方史志载洪波《滔滔妓女泪》一文。田家店、大桥、银锭巷均是妓院所在街巷。大桥、银锭巷都近卫河，《金瓶梅》提到的勾栏后巷当指此处的巷子。这也说明《金瓶梅》的地名，在临清大多可以找到根据。

四组 钞关、砖厂、教场

52回写“这胡秀递上书帐说道：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两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81回写敬济“……一日钞关上纳了税，放船过来，在新河口起脚，往临清县城里来。”

按康熙十一年《临清志》钞部下截：“户部榷税分司，明宣德十年（1435年）设关，以

御史或郡佐领之，无专职。正统成化间罢。景泰、弘治初再复，乃岁出主事一人，督收船料商税之课。课无定额，大约岁至四万金。……分季解京，以充内帑。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年）以东昌幕府一人，为监收官。”位置在“会通渠南浒”。乾隆五十年（1785年）《州志·张度序》记：“宣德十年置清源关榷税，以御史领之。”民国二十三年《县志·钞关》载文是：“明宣德四年设关于此，内有万堂、仓库、巡拦舍……。前为正关，有坊二，曰裕国、曰通商。……北为阅货厅。河内沉铁索达两岸，开关时撤之。隆庆元年关主事刘某……扩充之。”

上三条资料记载的年代不一致，康熙与乾隆州志说宣德十年设关，民国县志记宣德四年设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查明，这里说的是两处钞关。宣德十年设的关是指南水关。位置在会通河南支入卫河口处、南板闸之南二十米。即现在临清发电厂所对的卫河东岸，当地群众俗称“关厅”。此关曾为总关，下辖各税卡，主收卫河船税，并收会通南河船税。正统间，始隶户部榷税分司之下，为分关。《金

瓶梅》81回记的钞关，指此关。民国志记宣德四年设的关，是指设在钞关街的钞关监督衙门，位置在南支会通河西岸新开闸之西北，今为后关街二轻局处。此关初设时，主收旱路税，正统间升为户部榷税分司，又称钞关监督衙门，辖五处分关，南水关、前关皆在治下。

此关除领导各分关税务外，直接收南支会通河船税。52回胡秀说“韩大叔在杭州置了一万银子缎绢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这只船入临清城后循会通南支西行必经此关纳税，到南水关时，只查一下总关开的税单，便可放行入卫河了。

昔日关收税开单后，定时将关前设的铁索，从水面沉落河底，将成批船只放行，称为开关。随后将沉索以绞盘拉至水面拦行，则称闭关。每日漕船、货船数百艘只得在这座钞关以东至三里铺到歇马亭一段抛锚停靠，等待检查办理手续后再过二闸口（即新开闸）西经头闸口（即南板闸）入卫河。在新河口南水关复验后由卫河北行，还得再向三元阁税卡纳小税，再分别被安排到三元阁、狮子桥、广济桥三处码头卸货。据查在会通南河上未设码头。（只有

一处卸货口) 故书中提到的码头均指西河上广济桥与狮子桥二处码头。临清闸则不然, 有时是指南河的二闸口, 有时指北河入口处的“临清闸”, 按船只行进路线可以判别, 由南方来的船先到的是二闸口。由卫河中从北方来船先经过的是北支的“临清闸”。从以上对于停船待检、办理纳税手续、开关放行、码头卸货再加之私货成交的复杂过程看, 临清会通南河与城区卫河沿河常停船数百艘以上的情景是可以想见的。卫河中从头闸口起, 北至临清塔湾, 南河中从头闸口起, 东至三里铺、歇马亭, 绵亘二十余里、形成了“商航蚁集、帆樯如林”的壮阔景观, 这功绩是与钞关税卡分不开的。

再考临清砖依靠运河北运的情况。这件事, 在《金瓶梅》书中得到反映, 31回“有管砖厂刘太监差人送礼来。”25回“昨日砖厂刘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拔开筛了来。”这就是朝廷征用临清砖的确证。临清砖以质地优良和运输方便而被选中, 作为贡品, 专供朝廷修建宫殿、城墙、与陵寝之用。在北京的明十三陵, 清代的东陵等建筑群中随处可以看到“临清”砖的印记。明清临清砖的管理“设工部营缮分司督

之”。查工部司设在中洲，即今考棚街第三中学。该处前代称“工部厂”。分司下设砖厂，征收各客户送来的砖，并安排北运。每块砖均用黄裱纸封好，然后船运至天津直沽厂卸货复查后送往北京。城内砖厂有四处，按康熙年间地图查出，一在头闸口北，今为夹道街西南农田。一在广济桥处卫河东岸，今为竹竿巷西端处。一在卫河西岸，先锋桥西端偏南。第四处位置不详。砖厂刘太监、刘公公是指砖厂的主管，官品在工部营缮分司主事之下。明清两代临清沿卫运河与会通河两岸村庄有砖窑数百座，著名者有城东二十里铺、城南白塔窑、西南吊马桥、东北张家窑等五六处。由砖窑之盛可见明代砖厂之规模决非一般。厂主自然是受朝廷委派的“太监”之类的人物了。

书中还提到“教场”，临清既为畿南重镇，也必为兵防要地。明清设有兵备道、指挥使司、靖裁卫等军事机关，设有兵备、守备、把总、千总、游击、提刑等职官共有兵一万三千余名。其练兵场所就是“教场”、阅射厅等。兵备道设在砖城西南隅，成化间设。创教场二处，一为东教场，在威武门外，景泰间平江侯陈豫创，为

岁试考武之所，有大厅、观射台、驰马厅等设施，占地百亩，民国四年拆毁，约在今临清化肥厂附近。一为西教场，在靖西门外，明嘉靖二十年巡抚曾铣、副使王扬创建，今临西教场村有遗址。

五组 街巷

临清素有三十二趟街、七十二条巷子之说，现在巷子虽然不足数，街道仍有三十多条。这与《金瓶梅》所说的“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恰成数字的巧合。这又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现把书中出现的街巷与临清原有街巷名称对照如下：

帅府街：92回写：“刘二是有名的坐地虎；他是帅府守备府中亲随张胜的小舅子。”查明初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玉春在临清设府，后称此街为帅府街，今为先锋桥以东大街。

猪市街：6、7回写西门庆到猪市街。查志有此街名称，地址不详。

南关街：1回提到南关街。在今电机厂处。

南门外：指砖城永清门外。现永清路北端。

手帕巷：51回提到此巷，康熙志载此巷名，

位置待考。

菜市口：见15回，在今卫河西、临西县菜市街。

细米巷：见15回，今锅市街路西有巢米巷。

牛皮巷：今临清有碎皮巷，约在今商场附近。

臭水巷：见70回，是指从御史巷经大桥到狮子桥排水沟所经的巷子。在大桥处有一个很大的臭水坑，盖指此外。

此组地名考释欠详。但至少有前六个地名完全相同，四个已找到位置，后几个有一字之差。

六组 寺庙

晏公庙：见93回“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王老“领着陈敬济到晏公庙做了道士”。《康熙志》记有崔道士在晏公庙仙升云。知其是道士庙。经访问小白布巷85号八十岁老人张金春，知庙内供的晏平仲像。此庙位置在残存的月径桥西北100米处。他与邻居宅子就座落在晏公庙原址上。庙为民国初赵仁泉指挥拆掉。该院落内幸存数百年前古槐一

株，尚为丰茂。这个位置就在会通河北支（俗称死河子）入卫河口东200米，即明临清闸之处，与《金瓶梅》所说的“临清码头上有座晏公庙”完全相合。

莲花庵：见50回。按志载在怀朔门外。经访80岁郑关芳先生知为女尼庵，他幼年去庵中见有房三间，已荒芜。临清有一个传统戏目《莲花庵》即是写此庵，写一女因受婆母虐待而出家的故事。此庵位置在今城北油库西卫河东堤外，没有遗迹。

真武庙：39回“真武庙有个黄先生，算的好数。”查在怀朔门外渡口处有此庙，与莲花庵相近。另一处在西夹道街真武庙胡同，还有一处在今柴市街东口，不知究为哪处，现均无遗迹。

玉皇庙：见14回，在宾阳门内南坛，今约为杨桥村东南之苹果园处。

水月寺：96回写侯林对陈杨济说“明日我领你城南水月寺晓月长老那里。”志载：“水月庵在汶河南岸”，今约在永清街南端小庄之内。

地藏寺：26回写宋惠莲自缢后。西门庆贿

赔了知县三十两银子，让贲四、来兴儿同送到门外地藏寺，与火家五钱银子，加些柴薪，才待烧毁……”。30回又称地藏庵，故知有时寺与庵不分。志载宾阳门外有大藏庵，庵内有地藏殿，明末知州贺王昌建。位置约在杨桥村之东田地，无遗址。又在靖西门内有地藏堂，今在卫河西米市街南端。此处应指城东宾阳门外的大藏庵。

岳庙：见16回，在砖城广积门外，明正统二年建，民国二年关岳合祀，民国十七年已拆毁。约在今汽车站附近。

土地庙：39回写“吴神仙，云游之人，来去不定，但来只在城南土地庙上。”经查，砖城永清门即南门外有土地庙。还有其他几处，不能备考。

海神庙：志载有保运海神祠，在汶河之南，址在江坝桥西北。

观音庵：见50回。大宁寺街有观音堂，鳌头矶上有观音阁，保存完好。明人王英作诗咏观音阁，有“仰瞻帘外飞红日，俯瞰波高跃锦鳞。栋宇峥嵘先得月，栏干潇洒绝无尘”之句，不知是否指此。

碧霞宫：见84回，位在西夹道西半部。此宫相传为泰山娘娘的行宫，四月中迎请，邻

县亦来此进香，名曰朝山，盛会空前，五月送行。今位于发电厂之北，解放后已毁。

书中还记有石佛寺，城南有大佛寺。像这类寺庙《临清志》载有一百三十余处，颇难一一印证。仅举上例以见一斑。

七组 流沙河 夹道

26回中玳安对宋蕙莲说道：“嫂子，我告知你知道了吧，俺哥这早到流沙河了。”当西门庆审问众小厮是谁告诉宋蕙莲来旺被解徐州的事，忽有书童跪上说道：那日小的听见玳安跟了爹马家来，在夹道内；嫂子问他，他露了口，对嫂子说的。”临清城东由西南至东北有一条很宽阔的古废河，俗称沙河，春夏风多，往往喷沙伤禾。现在城东少数区段仍可辨识出河床与方向，土质纯为细沙，关于此河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古赵河无水则积沙，夏秋间水盛则成河。东流入高唐马颊河。一说是老黄河，为宋时决河故道。无论那一种说法正确，都告诉我们临清城东在明代以前早存在一条大沙河。这又是一条城市地理特征。来旺被押送着往徐州大道而来由城内取道向东，正经城东的流沙河。如果有人认为故事发生在别的城市，则也必

须具备向东走和城东有流沙河这两个条件。

再说夹道。一般说夹道是指狭窄的过道，窄至一个人侧身通过的也是夹道。本书所说的是不是这么窄小过道呢？不是。只要一分析就会清楚。玳安跟在西门庆马后，这时宋蕙莲走过来问玳安来旺的情况，玳安说露了口，才告诉了来旺被押送徐州的情况。这个能行马、对话的夹道实际是一条较窄的街道。在临清狮子桥街故址东面就紧靠着两条窄街，一条是西夹道街，一条是东夹道街。临清人简称为东夹道、西夹道。这不正是书中说的夹道街吗？

八组 香巷、蜡烛巷、银锭巷、白布巷、 箍桶巷

考完第七组地名，本待作结，忽又想起蔡国良先生写的《明代商业》等那几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来。他抓住以运河为地理背景而膨胀起来的城市商业这一观点去研究《金瓶梅》，这确实是找到了问题的本质，因为西门庆就是在那个私欲熏心的商业社会中堕地的怪胎。先生有一点不足之处，就是未能解开清河与临清的关系这一个结子。这一点，我就是从他的两句话中看出来的。他在引证资料证明了临清的

商业繁荣之后说：“临清既成为南北货物集散地，那么邻近临清的清河县自然也跟着繁荣起来。”（蔡著《金瓶梅考证与研究》242页）又说：“靠近商业运输中心临清的清河县虽不及京城繁丽，其盛况亦可想见。”（同书216页）。这种对主体城市清河不直接去写而用繁华的临清做为清河必然繁华的旁证的推论法显然是很牵强的。先生在这个地方，对作者托名清河实写临清的良苦用心未揣摸透，深信，如果先生来临清考察过或是手头有足够研究临清与清河的资料，就决不会出此疏误的。

为进一步认识临清在《金瓶梅》书中的重要位置，尽管本组地名在书中未直接出现，（而触及的只是商业与手工业门类名称）在此说明一下，也不是毫无用处。51回写道：“东平府又派下二万香来了”这说的是生产、上纳供香的交易。临清有两条很长的巷子，一名前香巷，一名后香巷，就是做香的地方，现处于先锋路之北。

38回：“三万香蜡等料钱下来，该一万两银子，也有许多利息。”45回又写：“蜡里多搀些柏油，那里查帐去。”这说的是做蜡烛获取

利润的事。临清有蜡烛巷，在锅市街的北端。

90回写来旺“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家里，学会了此银行手艺”，“卖些金银生活首饰花翠。”20回写李瓶儿从箱内“拿出一件金厢鵝青帽顶子”，让西门庆拿与银匠替他做一对坠。下文写出一些要打造的银饰名目。据访问，临清的银锭巷就是分割金银、打造银饰的巷子，在狮子街北。今在大寺街之南。

81回写因“山东大旱，不收棉花，布价一时涌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上，迎着客货而买。”这里说的是布匹交易，临清也有两条巷子，一条叫小白布巷，一条叫大白布巷，至今均未易名，位置在卫河的东岸。

书中写马桶子，（即马桶），有人即以马桶子不是北方用具，而论定写的不是北方城市。据调查：马桶是运河船家的必备用具，沿河人家亦多使用。用马桶之广已经对习俗产生了影响：女子出嫁时赠送的嫁妆中，就必须有马桶。这件事，凡当地50岁以上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临清仍未易名的马桶巷的主要产品中就有马桶。这实在出人意料吧。其它如书中写到

的当铺，临清有估衣巷。书中写绒线铺，临清有线子巷。书中写灯市，临清则有灯挂胡同。书中写葬品，临清就有纸马巷。书中写马市，临清又有马市街，等等。这些街巷都是以从事的行业而得名的。此类例子，真不胜枚举。临清店铺之多据对《神宗实录》卷五中万历三十年的统计：临清有绸缎店三十二座，布店七十三座，杂货店四十一家以上，这不正是《金瓶梅》写的各类店铺在临清的实际情况吗？

现在将本文归纳一下。文中详略不同的对47个地名作了考证。这些地名可分为五类：

1、有显著地理特征的13处，包括临清运河、码头、广济桥、二闸、临清闸、新河口、狮子街与灯市、大酒楼、晏公庙、永月寺、地藏寺、流沙河。这些地名不但临清实际与书中所写完全相同，而且地理位置也很一致。如酒楼的面对官河、背靠山峰，晏公庙面对官河，在临清码头上，流沙河在城东等。按照这些地名我们能够判断书中角色活动的方向与路线。这类地名是重点，多数做了详细考证。它们给《金瓶梅》一书打上了临清独有的商标性印记，其专利属于临清。如果说还有其他城市也

出现如此多的上述地名，同时还必需以其与书中地理方位相同为佐证。

2、与书中地名相同的16处，包括钞关、砖厂、教场、帅府、手帕巷、菜市口、南大街、南门外、猪市街、牛皮巷、莲花庵、真武庙、玉皇庙、岳庙、土地庙、夹道。前四个地名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作了详细考证。

3、与书中地名基本相同的7处，包括海神庙、观音庵、碧霞宫、石佛寺、细米巷、臭水巷、勾栏后巷。

4、书中写出行业式店铺名称，而临清有街巷名称的有10处。包括：香巷、蜡烛巷、银锭巷、白布巷、箍桶巷、估衣巷、线子巷、纸马巷、灯挂胡同、马市街。

5、其它地名城市1处：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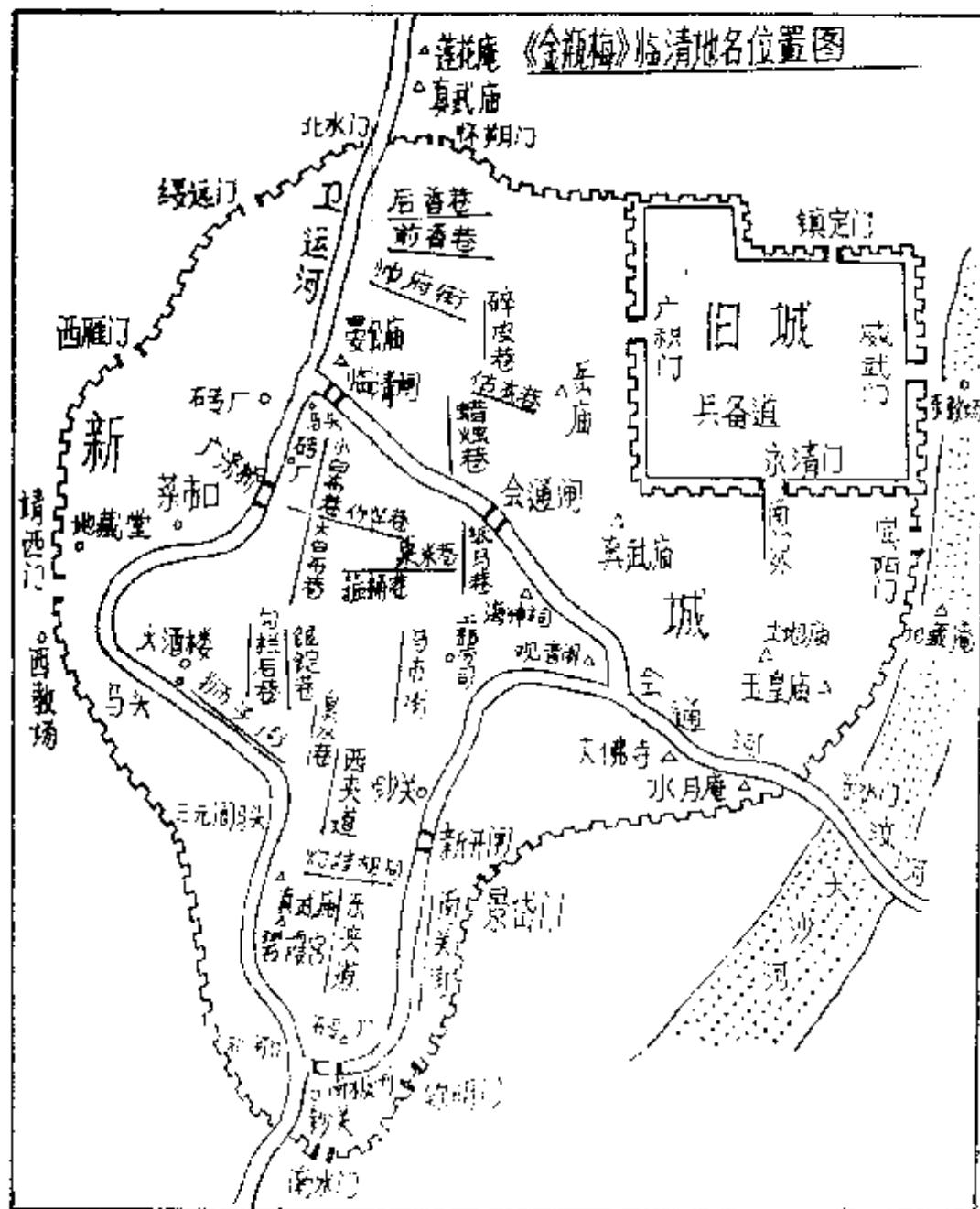
从以上粗略的考察可以看出，《金瓶梅》作者对临清是非常熟悉的，简直是一个地道的“临清通”。反过来说，《金瓶梅》一书非是“临清通”而决不能为，作者只有在这个环境中长期的生活过，感受过，才能在他思想中形成一幅致密的地理图象，并把他所感到的人物、情节如此生动逼真地交织进去，构成一部从思

想到艺术上完整统一的长篇巨制。有人超脱这一环境，而只从个别事物特征上论证不是写的山东，而是写的江南等地的事情，这是违背一般的创作规律的。具有长期的（而不是短暂的）在临清居住生活的历史，应是作者具备的条件之一。由此还可以导出第二点推论：《金瓶梅》一书所写的人物、市俗民情也是以明代临清为主要背景的，所用的方言也是以明代临清土著方言为主导方言与外地方言组成的整体，因为人物、情节、语言不可能与写作的主要环境完全脱节。

研究社会科学的傅崇兰先生在临清作了全面考察之后说：“临清居运河的要冲，‘帆檣并集，百货流通，商贾操厥奇贏，趋利若鹜。……’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一个著名的绾毂南北的商业城市。”（见《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287、292页）临清对研究明清运河城市的形成、明清商业与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为方便读者，今将所考临清地名绘制成图附于下面。

·莲花庵《金瓶梅》临清地名位置图



临清城址初考

徐登阶

临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县名、城址已几经更改、迁徙。在修志活动中，对临清县城变迁，加深了探索和考证。今就浅见所得，分述如下：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设清渊县。据1983年《馆陶县地名资料汇编》载：位于路桥乡驻地东北1.8公里处的清阳城村，系古清渊县城故址。

东晋时，后赵石勒建平元年（公元330年）将清渊县改名为临清县。此为临清称县之始。隶属建兴郡，至今已有1650余年之历史。《续山东考古录》称：临清县故城在今河北临西仓集，但不久又废。

后魏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在河北临西仓集镇，即今临西县城，复置临清县，隶属于司州部阳平郡。至今城东尚有旧城遗址。此处原建有一寺，名“月洼寺”。旧寺遗址犹

存，在今临西县啤酒厂东。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从临清境内西部（含临西县地）析置沙邱县。故后人称临清为沙邱。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沙邱并入临清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由临清县内析出，复置沙邱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并入临清县。当时临清县城仍袭后魏旧址（即仓集镇），沙邱县城址待考。

唐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析临清另置永济县。《馆陶县志》载：永济县故城，即北馆陶（今属山东省冠县）。《元丰九域志》载：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撤永济县为镇，划入馆陶。不久改属临清。

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建水，临清移县治于曹仁镇。《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曹仁镇”条释文：在山东临清县南八里。即今临清市杨桥乡旧县村。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县治由曹仁镇迁至中洲纸马巷。今临清市福德街南端阁楼门楣上有：“县治遗址”石刻。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又兴建砖城。嘉靖廿一年（公元1542年）在砖城外建土城。至今城址再未变迁。

临清文化舞台

王洪辰

临清是汶、卫二水汇流之处，明、清两代谓之漕运咽喉。因之侨商游宦纷至沓来，五行八作云集昌盛。世称京杭大运河岸边江北重镇之一。“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这两首七言绝句是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对临清的真实写照。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六年南巡回銮时途经此地赞曰：“临清傍运河，富庶甲齐郡。”由此可见临清很早就是人烟稠密、工商发达、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地方。经济的繁荣给文化设施奠定了物质基础，城市的发展又给艺术团体提供了活动市场。所以临清城乡各式各样的舞台随着庵、观、寺、庙的兴建应运而生。这些舞台又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人类信仰的更替，不论在舞台建筑风格形式上、经营管理方法上、上

演节目内容上都在不断地改革与创新。

一、旧式舞台

(一) 楼阁舞台。据查，明清两代临清的庵、观、寺、庙古建筑群中，往往舞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戏楼和戏台两种，多设在山门之内，正殿之前与所祀神像的宫阙相对。楼与台之分在于底层有无通道。有者称楼，无者称台。但是戏台比戏楼在方位的安排上自由一些，可以建在庙外，自成体统，更不拘泥于东、西、南、北固定的朝向。楼与台一般都是前部三间为演唱之区，后部三或五间为演员化妆休息之所。这些楼台前部皆为悬山式卷棚顶，后部尽是正脊顶楼阁式。两部之中以墙为隔，开左右两门以通内外。门楣多有“出将”“入相”或“海市蜃楼”为榜。前部不仅是雕梁画栋，而且还有玲珑剔透的雕饰品和构思巧妙的彩绘艺术。其图案多是梅兰竹菊花鸟虫鱼、麟趾呈祥、喜鹊登枝之类，同时有文武戏出和二十四孝图。

(二) 席棚舞台。在旧社会凡是谢雨、谢水、名人立碑挂匾、祝寿喜庆和还愿，或是定

期的庙会等，只要没有固定的舞台，就必须届时租赁物料雇觅工匠，择地点搭席棚以应演出。这种临时性的舞台俗称戏棚，大小优劣不一，因经费的多寡而定规格。大体有三种形式，最好者是“气死风”戏棚。其规模分前台（演出区）、后台（化妆区）、神棚（祀神区）、罩棚（男众看戏区）、茶棚（男众看戏区设有座位）、看棚（女众看戏区）六大部分，全以杉篙支架裹以双层苇席，顶盖能遮雨雪，围墙可避风沙。整个棚内悬有彩带、花团、宫灯等点缀品，五光十色，耀眼夺目。其次是“不见天”戏棚。它仅有前、后台和神棚部分。两者之间搭有狭窄罩棚。会首们坐在神棚看对台戏，不见天日，不受风雨之苦。男众看戏虽在罩棚下也难免风吹日晒。而女众看戏尽在露天，一遇雨雪苦不堪言。两种戏棚虽有差异，但前后台基本一致，都是用若干方杌或板凳为柱脚，其上横放木梁做架，再上面用厚板铺平为台，高约五尺，宽为三丈，深有四丈左右，分前后两个部分。其用途同于楼台。最差者是露天戏台，它无木质底台，而是随坡就崖整地作台，有几根木棒作立柱，用几领

席、箔掩裹一下，使后台能与观众隔开而已，谈不上防风寒避雨雪。群众往往因天气不好而看不成戏。

上述舞台之设，不论是戏楼、戏台还是席棚，都是为神道而设，为庙会所用，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有的庙会是一年一度，也有的是一年数度举行演戏活动。每到届期，会首们提前操持准备演出事宜，并派员外出寻找班社邀来演出。会期一般是四天，也有的是六天。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次开锣演戏。如遇风雨天停演，会上只管班社生活费不交戏价。锣响算一场，须开半价，停演几天补演几天。整个会期的全部费用统由会首们操持。其中，少部分是善男信女们的进香钱，大部分是向到会的商贩们收取。按其生意大小适当分配金额，而且逐日交纳。这样做是预防商贩们最后潜逃不交。群众看戏分文不取，一律免费。

二、舞台匾额及楹联

为了显示当地文明给戏剧楼台溢美，不少文人为其题书匾额撰写楹联，甚至约请名家赐墨留念。凡固定楼台多是木匾瓦联或石刻。临

时舞台则用纸联，两者文采各异，寓意有别，均雅俗共赏，耐人寻味。其内容有命名的，有题词的，也有纪胜颂德的。魏湾乡东辛庄（原属清平）三义庄戏楼（山西会馆）上悬有“有清犹汉”、“忠义千秋”、“曜若三光”等匾额多架。“青阳保障”金字大匾则悬于底楼洞门之上。此是清代同治年间县知事桂昌手书。从这些匾额中不难看出都是为刘关张桃园弟兄颂德壮美，这就突出了庄堂自身的鲜明特征。魏湾西街真武庙戏楼上，白地兰字大匾悬于舞台正中，其“梨园风景”四字潇洒飘逸远近闻名，世称妙笔。它是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状元礼部左侍郎聊城布鍾岳题书。“海市蜃楼”分别雕在“出将”“入相”两门之上。明柱之上有副瓦联更是意趣横生。上联七字“传传传传传传传”，下联七字“调调调调调调调”。作者以中国文字字同义不同的特点缀成此联颇具匠心。老赵庄乡王集（原属清平）娘娘庙戏楼匾书“观止楼”以显其雅。用剧目名称组成的对联更具特色。上联是“黄天荡、黑风台、青山英烈”，下联是“红梅阁、白蛇传、兰英思夫”。一付对联竟嵌入六个剧名，六种颜色可

谓佳作。卫河东游碧霞宫戏台楹联是：

“你挤我，我挤你，此处挤无立足地，
好歹看，看好歹，大家看有下场时”。

“要听早些来妙机关全在起首，
既看完了去好结局尽在后头”。

胡里庄镇鹁鸽李庄汤逸生先生介绍本村唱
戏时的对联是：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臣父子俱
是梨园弟子，

哭装哭笑装笑打装打闹装闹哭笑打闹一片
上下热闹”。

“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引笑，
看今人看古人今人古人人看人”。

陈耀庭先生介绍的对联是：

“黑脸忠红脸义白脸奸悍，
老旦庄正旦重彩旦风流”。

“你一刀我一枪不伤不死，
骑骏马坐八抬不走不行”。

粮局退休干部马遇昌先生介绍胡八里戏棚
对联是：

“看不见姑且听之何必四处钻营极力排开
前面者，

站得高弗能久也莫仗一时得志挺身遮住后来人”。

“凡事莫争前唱戏不如看戏好，
为人须顾后上台总有下台时”。

支振东先生介绍的对联是：

“愿听者听愿看者看看两便自取，
说好就好说歹就歹好歹都是教人”。

“金榜题名虚富贵，
洞房花烛假姻缘”。

上录舞台楹联虽不知作者姓名，但它的魅力感人，既有深奥的哲理性，又有完美的艺术性，读来上口，耐人回味。

三、新式席棚戏院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之后，华北出现了稳定局面。临清由于河道的重新疏浚运道畅通，于是百货云集、市场繁荣。广大农村普遍引种了美棉，人民收入大为提高。京津沪汉各大城市的富商大贾来临贸易者逐日增加。因此一些眼光敏锐的士绅商家看到经营戏院有大利可图。一些旧式戏曲楼台因拆庙拉神破除迷信而毁之大半，不宜使用。再兴建新的

楼台既费时费力费钱，而远水不解近渴。所以三五成伙，自愿结合于中洲商业区，争相选择地点搭席棚邀班演出。首先有程姓在邱家胡同搭棚开业；其次是肉铺大掌柜沈某在公馆街开业。尔后漫塘掌柜马某在西夹道开办了卫生大戏院，接着估衣街的赏心戏院，后营的新中国戏院、养济院的光明戏院相继落成开业。设备齐全、坚持最久的是元宝街街长李桐在商场街董家大院开设的民生戏院。上述席棚戏院从外型上看与“气死风”席棚近似，但设施和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新式席棚无神棚之设，演出舞台高约三尺，池内设长凳和条桌。观众不再像过去那样站着看戏或因打轰被挤倒踩伤以致丧命，而是坐在凳上对面谈心还可吃茶。不过欣赏戏文却要侧着身子斜视舞台。池内水柜的问答声，壶碗的叮当声，小贩的叫卖声和观众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往往淹没了演员的唱念声。端茶送水的身影又往往隔断了观众的视线，使演出效果大减。这些大掌柜们只顾赚钱而不择手段，更不问演出效果如何。进门时须买门票，吃茶按座收费，递手巾擦脸还得付小柜钱，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四、新式礼堂、剧院和影剧院

解放前砖木结构的戏院临清只有“慕善”一家。座落在鳌头矶西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会会长王荫轩主办、马兆礼负责设计，图纸大部采用北京哈利菲舞台。造价两万元，其来源是安徽省主席刘振华北伐时期驻临清所欠的军事还款。该戏院系砖木结构，分舞台和观众厅两部分。座位九百余个，分楼上楼下。楼下设藤椅，每四人为一组。按扇面形排列，座前置茶几供放糖果茶具。楼上为包箱，箱与箱之间木板为隔。观众仅能欣赏戏文，不得左顾右盼，演出时也有小卖送茶递手巾之风，但比其他席棚戏院文明得多。观众既不赤胸袒臂，更不吵闹喧哗。其门脸装饰较美，上塑鲤鱼跳龙门彩色图案。

“慕善戏院”四字系陶质浮雕，上款书“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建”，下款书“崔肇琪书”。就当时来说在鲁西北无论是建筑风格、演出设备；还是经营管理，临清慕善戏院首屈一指。解放后，该戏院曾易名“大众戏院”由商会会长李耀堂题书。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乡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新型的礼堂或者戏院

相继出现。领先的是康庄“红星剧场”（当时是清平县府驻地），其次是老赵庄“人民剧场”和松林镇影剧院，但是皆以开会为主兼演电影，有时也约剧团演戏。名符其实地专业性文娱场所，只有临清剧院和东方红影剧院。其具体情况略作介绍：

临清剧院。一九七九年九月经县委、县革委研究决定将原大众戏院拆除，在其旧址重新扩建。以县委副书记胡雷同志为主，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筹建领导小组。省地县三级领导部门投资百多万元，历时三年多，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落成开业。整个建筑系砖、木、石、砂、钢筋混合结构。南北长五十一米，分观众休息厅、观众厅和舞台三大部分。前厅上中下三层，除观众休息室外，附有若干房间供剧场剧团应用，比较宽绰。观众厅南北长二十四米，东西二十四点五米，楼上楼下备置单人铁椅一千四百二十七个，每个观众都能看到舞台中心。后台东西三十四米，南北十七点五米，高二十一点三米，可安装升降吊杆，备有大型开关柜一台，可供国家级大型团体使用。该剧院由崔凤舞、单洪友、马伯俊合作设计，图纸近

似天津黄河道剧院。中国书法协会主席舒同、山东书法家高启云分别题书匾额，以示关注。

东方红影剧院。一九六六年春，原民生戏院经理李来祯和齐祥斋、孙一英、李增英等研究迁建民生戏院，四处奔走申述理由，由聊城行署核准于砖城内空闲地带兴建影剧院，命名为“东方红影剧院”。舞台、演员宿舍和广场共占地一十三亩。原民生戏院旧料和运河岸上启秀楼的物料概归使用。动工不久，“文革”开始。几经周折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完成主体工程，仅能勉强维持演出。尔后边修边用维持现状。一九八四年孙荫旭出任经理。经过积极努力取得了多方支持，从而进行修缮和装饰。首先利用吸音板吊顶，同时以吸音材料处理墙壁，大大提高音响效果。新添金属立体银幕和东风大座机，能保证影片放映时声光俱佳。院内装有风扇和暖气，观众不受寒暑之苦。门前广场平坦宽广，观众进出方便，可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为该院题写了匾额，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它的艺术魅力。

五、剧种、剧团和剧目

清末民初在临清一带流行的剧种《临清县志》上载有“吾临所尚秦腔最多，次则为乱弹，演皮簧者几如广陵绝调。乡曲之间有所谓四根弦者”的记述。《清平县志》亦有类似说法，即：“清俗所尚秦腔、乱弹之外，演皮簧者已成绝响，若穷乡僻壤演有四根弦、蹦蹦。”由此可见当时演出剧种以秦腔、河北梆子为主，兼有京剧、乱弹、四根弦和蹦蹦（评戏）。据耆老们介绍鲁西北一带过去流动演出的班社都是以主演命名的。影响较大的有一声雷班、铁蝎子班、段双桂（又名段法擅唱须生）班、脆萝贝（本名刘永祥擅演丑角）班，河南王（本名贾玉璋擅演须生）班、三学贤（擅演青衣）班、宛香玉（擅演青衣）班。上述班社皆演河北梆子。它们都是实行老板掌班制。一年两季和各行当地演员订立合同组成剧团应聘到各地演出。这种班社的盈亏由老板个人负责，演员们按季节领取身价。每到一处演出，由报单人（实是外交）带领主演们先行拜庙参神，再去到会首门下拜客。拜客结束后呈上戏单请其点

戏，即指定某一主角演某一出戏。如演出使其满意，点戏人即行馈赠。

当时流行的剧目在内容上极力宣扬封建迷信循环报应，提倡忠臣义仆节妇烈女，在题材上多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如《渭水河》、《临潼斗宝》、《长板坡》、《马义救主》、《斩莫成》、《算粮登殿》、《活捉王魁》、《红梅阁》、《杀子报》等。

当时除了正式班社之外，城乡均有一些业余戏曲爱好者自愿组织起来自演自唱自我娱乐。人们称其为社伙又称子弟班。他们有时也受聘到外乡演出，但只作义务助兴，从不收费。城区著名者有二：一是观音嘴的二簧会，聚散地点是上湾街孙家茶馆。主持人先后是王兰亭、张润身（银匠）。活动骨干有陈洪太（油漆匠）、孙清源（茶馆掌柜）、陈二富（搬运工人）、徐老彦等。他们曾从北京约来黄处老师教戏。陆续排演出《天水关》、《空城计》、《借东风》、《斩子》、《吊金龟》、《滑油山》（又名目莲僧救母）等。群众称他们是小八出。二是前关街的永聚会（河北梆子），活动中心在冀家大院，由房东冀自新主

办。参加者有邵茂三、张三宪、焦瑞生、林茂青、王寿昌、汪墨林、洪宝生（又名盖宝红）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大登殿》、《武家坡》、《教子》、《杀庙》、《战北原》等。在乡村较为突出者有三：一是田庄吹腔。该剧种属柳子系统以演唱曲牌为主，常用曲牌有驻云飞、山坡羊、驻马听、耍孩儿、大青阳等，演出剧目上百个。如今尚保留着清代道光三十年田化龙手抄本六个。其名称是《讨荆州》、《双龙关》、《关封王》、《韩江城》、《霄亭庙》、《蝴蝶梦》。在该村这个剧团（业余）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从侯老安到侯瑞祥已是五代传人。解放后该团曾吸收女学员路金梅、田庭艳、赵金梅等学唱吹腔继承传统，从而改变了以往男扮女装的常规。一九五一年田廷雪引荐夏振环、夏振河等去北京中国戏曲研究院求援请教，由程砚秋接见并听了演奏，同时对《挂红灯》一剧进行录音播放，标名为清平剧。二是吉庄四根弦剧团。据四根弦老人赵喜莲介绍她丈夫郝长训青衣、包头、大生、小丑样样能演。以前在济南搭班唱戏。解放后回到家乡组织业余剧团演出并且去孙尔寨、白

佛寺、温庄等地教戏。经常上演的剧目有《二龙山》、《打蛮子》、《抱牌子》、《卖孩子》和四秦（东、西、南、北）等。三是老官寨的乱弹。主演有擅长须生的王长法（绰号王四），擅长青衣的闵玉奎，擅长花旦的吴青山（绰号吴六哥）。他们的剧目多是蟒考戏以反映帝王将相和宫廷生活为主。如《大刀王怀女》、《杨金花夺印》、《金钱豹》、《汴梁图》等。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临清京剧界的票友徐福田（又名徐响五、徐又我）、沙建侯、徐方田等集会演出表示庆贺，其《坐宫》、《盗令》和《起解》等剧目，受到驻军的热烈欢迎。尔后，军、学两界又合作组成了新剧团，对旧剧进行改造，把一些淫荡荒诞的东西进行了删除，增加了光明健康和通俗的成份。同时配合形势排练新戏。当时影响较大的新戏有武训小学教师铉慕儒和第一高小教师丁子元合编的《马占山守孤山》，徐福田编的《傀儡皇帝》，周惊湖、丁子元、徐福田合编的《大义灭亲》和《三难民》。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鲁北民团指挥部驻防临清。有个副官叫张云涛他很爱好京

剧，因而在进德会（大众公园）组织了中山国剧社。越二年易名进德剧社，改由图书馆长徐福田具体管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戏剧爱好者踊跃参加，如张宝彝、李景波、张培勋、白汝珍、白汝修、王泽波、王廷臣，谢锡英等。他们从北京约来张焕亭、于冷华作教师，每人每月工资待遇是四十块现大洋。此间先后排演了《御碑亭》、《捉放曹》、《吊金龟》、《打渔杀家》、《法门寺》、《清风亭》、《宇宙锋》等剧目。从而使临清的业余京剧活动更加活跃起来，同时净化了舞台，使演出增加了新的思想内容。

但是，自席棚舞台兴起之后，戏院老板们为了追求票房价值，极力怂恿剧团演鬼戏、坏戏和连台本戏，以争夺观众。当时盛行的剧目有《七十二本西游记》、《封神榜》、《狸猫换太子》、《呼延庆打擂》、《杀子报》、《探阴山》、《黄氏女游阴》、《桃花庵》、《马寡妇开店》、《小老妈开嘴》等剧目。演员们为了哗众取宠追求叫座率，在舞台上尽力卖弄风流大出洋相。凶杀恐怖、色情淫荡、庸俗下流之风无奇不有，实在不堪入目的是摇帐子，

掀大腿。最令人恶心的是真马真牛上台，有时弄得粪尿满台，臭不可闻。

八年抗战期间大部戏曲班社解体，艺人转业。临清城内日伪军占领，三天两日戒严，戏院封闭，路断行人。因此临清舞台陆续倒闭，能够维持演出者只有民生和慕善两家，而且营业亦不经常。经理们煞费苦心的约来过金钢钻（河北梆子），费玉策（京剧），崔盛斌（京剧），曹金顺（评剧），李金花（评剧）和日本杂技魔术团，但其经营仍属惨淡，观众寥寥。

一九四五年九月临清城获得解放，第一个进城庆祝的是我党领导的“鲁西北新生剧社”。团长党春祥，主要演员有胡庆华（武生）房德虎（花脸），袁润红（女须生），刘永祥（小丑），王宝云（女花旦又名盖五朵），白牡丹（旦角）等。演出地点在碧霞宫戏台，演出剧目《风波亭》、《花木兰》等。

尔后，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旧的戏曲楼台尽被拆除，广大艺人分房分地安居乐业。鲁西北地区能够演出的文艺团体除“鲁西北新生剧社”外，尚有我野战二纵四旅政治部领导的

“解放剧团”和以田武仲为首的北海军区“光明剧社”。解放剧团是解放高唐县郭庄时接管的私人班社。主要演员有刘鸿声（老生），姜云霞（女武生），娄崇玉（净），朱永祥（丑），王晚秋（刀马花旦）等。此外，李和曾、吴素英合作组成的南宫京剧团亦时来演出。

一九四七年以光未然（即张光年）为团长，由吕班、赵起扬、刘喧之、周予、张玮、万声、乔羽、刘大海、田霞光等组成的“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北大剧团曾来慕善戏院演出。其节目有《白毛女》、《周子山》、《兄弟参军》、《三江好》、《大秧歌》等。他们的演出促使了临清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给编演现代戏树立了榜样。

随着形势的发展，当时的临清政府下设了大众教育馆，专门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三十六条街，街街都有业余剧团，真是村村锣鼓响，街街歌唱声。郭堤小调剧团，田庄的吹腔剧团，吉庄的四根弦剧团，梁庄的河北梆子剧团，齐楼的京剧团和洼里、寥庄的大秧歌较为突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城内的业余剧团比乡下更加活跃，其佼佼者有考棚街的“先锋剧

社”、吉士白的“群艺剧社”、箍桶巷的“曙光剧社”和米市街的“爱民剧社”。先锋剧社演评剧，参加者多是青年，主要演职员有徐宝江、徐敬堂、徐秀芳、黑玉华、马玉芝、吴彬昭、吴彬然、邵玉凤、陈忠成、陈耀庭、王金玉等。他们特聘郭艳芳、单小峰作导演。为了配合政治运动的开展，专门赶排新戏，如群运时的《赤叶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大参军时的《王大嫂劝郎参军》、《崖鹏举送子参军》、《张德宝归队》；贯彻婚姻法时的《小二黑结婚》、《小女婿》、《良女劝母》、《刘巧儿》、《夫妻识字》；抗美援朝时期的《四个大饭桶》；三反五反运动时期的《救济包》等。这些剧目对广大人民起到很好教育作用，促进了中心工作。群艺剧社演京剧，曾聘专业剧团主演筱丽娟作艺术指导，排演过《打渔杀家》、《捉放曹》、《马前泼水》、《河伯娶妇》、《起解、会审》、《御碑亭》以及新编历史剧《英烈千秋》等。其演员以原来进德剧社的班底为主，又吸收了英占鳌、彭嘉瑞、陈福海、王振国、由厚德、庄桂荣等。此外，其他业余剧团也排演过不少新节

目到工厂、街道、机关、学校进行义务演出，从而大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一九五八年临清城乡舞台上演节目基本达到了新化。为了繁荣创作、扩大宣传，中共临清市委下设了文艺宣传委员会，定期刊印“临清文艺集锦”。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纠正“五风”错误。国家实行精简机构，调整文艺团体，一些专业文艺团体有的被撤销，有的被合并，有的被下放，所剩无几。业余文艺队伍更是禁止活动，明令解散。广大农村常年无戏看，城内舞台营业尽萧条，偶有剧团来临演出也深受“大胆放手、开放剧目”影响，将一些明令禁演的鬼戏、坏戏，色情戏重新放出笼来；把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挤下舞台。唯有中央和省级的艺术团体，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新老剧目相结合，巡回演出树立榜样。

十年动乱文化遭难，临清舞台上由百花齐放变成了一花独放，演必样板戏。从大的方向来说，演现代戏是正确的，但是“三突出”创作原则限制了作者的自由。所以此间上演的剧目千人一面，帮气甚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像春风一样驱散了乌云绿化了祖国。临清城乡和全国一样，呈现出市场活跃、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不少戏剧表演艺术家、歌唱家、音乐演奏家和曲艺演唱家们率团莅临演出，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食粮的需要。同时临清京剧团亦邀过不少外地著名演员前来传艺，并合作演出。

六、舞台百花放，新葩朵朵香

临清这个舞台近百年来上演过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予剧、越剧、曲剧、吕剧、茂腔、武安落子、丝弦、大笛子、乱弹等几十个剧种。著名表演艺术家、歌唱家、音乐演奏家和曲艺演唱家奚啸伯、袁世海、李世济、徐翰英、李和曾、杜近芳、李慧芳、唐喜成、牛得草、马金凤、海连池、韩俊卿、银达子、郎咸芬、斯琴高娃、姜昆等，都来这里献出绝技显过身手。他们不仅给临清广大人民送来了欢乐，送来了精神食粮，同时也促进了业余文艺活动的发展，对业余文艺队伍的成长壮大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诸如李景波、张保彝、王玉

卿、阎玉贞、周明仁等，都是生在临清，学艺在临清，通过临清这个舞台的实践和锻炼崭露头角之后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大舞台的。从业余文艺活动转入专业团体并有显著成就。

展望临清舞台的未来，深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将会“园地文明貌堂堂，遍插梧桐引凤凰。惊闻声振千里远，醉看舞现明珠光”。

吕才与《秦王破阵乐》

马鲁奎

在历史的长河中，临清这块丰腴的土地上，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不仅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精神财富，为丰富我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文苑撷英，仅就音乐一隅对唐初著名音乐家吕才作一赘述。

吕才，博州清平（今临清市）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卒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其出身庶族家庭，“少好学”，“善阴阳、方伎、舆地、历史诸书，尤长于音乐”，后直弘文馆，官居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他在音乐方面建树卓越、才华非凡，倍受时人赞誉。贞观初，他就奉太宗（李世民）御召参论乐事，“所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每每宫廷乐事，他便执麾协律，“举麾乐起、偃麾乐止”。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宴待从臣、赏赐间里，情酣意奋、赋诗抒怀，

遂命吕才依诗谱曲编舞，教以童儿六十四人，头戴进德冠，身着紫裤褶长裳，漆髻屣履而舞，此舞名曰《功成庆善乐》（因太宗生於庆善宫而名），后更名为《九功舞》，此舞连同吕才于贞观七年（633年）编制的《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及《上元舞》一起被誉为唐王朝著名的三大歌舞大曲。三大歌舞大曲问世不久，就东传日本、西闻天竺（古印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秦王破阵乐》，又名《七德舞》（“七德”源于《左传》宣十二年。指：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此舞是颂歌李世民征讨叛将而取得胜利的歌舞大曲。李世民在其父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封为秦王，他通晓兵法，骁勇善战，在武德二年（620年）讨伐祸国殃民的叛将刘武周、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的征战中所向披靡、战功赫赫，当时民间传诵起“秦王破阵乐”歌谣。李世民即皇位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和舆论的需要，于贞观七年（633年）命吕才依民间歌谣改编谱曲、绘制舞图。这又命魏征、员外散骑常侍褚亮、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药等文臣学士改写歌词，使之成为一部有三变（三大段），每变为四阵

(四组舞蹈造型)，五十二曲，需要一百二十名乐工参加演出的大型歌舞。

唐代舞蹈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健舞”常用于表现与战争有关的乐歌，《秦王破阵乐》即属于“健舞”。在音乐创作上，吕才既熟悉乡曲民俚，又精于宫廷宴乐（隋制，亦称“燕乐”，唐初由九部乐发展成十部乐），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不少西域少数民族及国外西凉、龟兹、天竺、高丽、疏勒等音乐语汇，与中原汉族清商乐等音乐素材融会贯通，编谱而成，使整个歌舞大曲既有大漠旷野粗犷奔放的气息，又有宫廷御园优雅细腻的乐风，以一种全新的音乐格调，一扫从南朝传袭下来的过于软弱的柔歌曼舞之习，产生了极强的艺术魅力。不少史料对此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新唐书·礼乐志》称：“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唐太宗宴会群臣及欢迎外国使臣，演出这部歌舞大曲的盛况，在《新唐书·礼乐志》、《旧唐书》、《唐会要》等史料中都有记载：入夜，太极宫里灯火辉煌。在雄健激越的笛鼓声中，头戴银胄、身披银甲的一百二十名乐工，手执剑戟踏节出场，由左圆右方的队形渐渐散

开，向各个方位有条不紊的交错变幻队阵。忽儿变成群鱼竞游的“鱼丽阵”，忽儿呈现宛若鹅鹤展翅的“鹅鹤阵”，随着又伸展两翼演化为箕形。此时，歌舞以丰富的舞蹈语汇，参以洒脱的武术套路，击刺往来、纵横劈杀，并激昂呐喊，引吭高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这时整个舞列里金鼓铿锵，钟声合鸣，舞姿万千，欢声雷动，把歌舞演出推至最高潮，就连观舞的群臣及异邦使节也都情不自禁的呼喊“万岁”，随着节奏手舞足蹈起来。“新唐书·礼乐志”形象地记载：“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这种每宴必舞，每舞狂欢的盛况在唐朝代代相袭，“破阵乐盖唐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足见其歌舞艺术魅力及影响深远。其后，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又命其在祭天、祭太庙等祭祀活动中演奏。唐高宗时的《神功破阵乐》；唐玄宗时坐部伎的《小破阵乐》也均源于此。不少文人学士也以此吟诗赋词，遗文千载，如：唐元和四年(809年)，诗人白居易就曾以新乐府《七德舞》为题赋诗，诗中写

道：“七德舞，七德歌，传至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观乐听歌知乐意，乐终稽首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归心。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千余年来，吕才及其《秦王破阵乐》一直受到史学界、音乐界的重视，《旧唐书》、《新唐书》及现今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辞海》、《中国音乐辞典》、《中国文化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等都为其列传记载，近年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以将其列入《齐鲁文化六十名人》之一，作为文化艺术科学科研项目进行研究。

《秦王破阵乐》不仅在国内源远流长，而且以磅礴的气势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在唐朝就东传东瀛（日本）、高丽（朝鲜），西闻天竺（古印度）等异邦。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派遣犬上三田耜为遣唐使之始，不少判官、录事、留学生、学问僧就纷纷涉海前来学习唐代歌舞并传播至日本国，对此，《日本史·音乐志》有较详细的记载。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时，还观赏了

日本演员表演的《唐代乐舞》。更令人兴奋的是：时至今日，日本还存有奈良朝时据此传写的《秦王破阵乐》琵琶曲谱。还珍藏着有关唐代乐舞、百戏的画卷《信西古乐图》，其中就有生动绘下的《秦王破阵乐》雄健的舞姿。使其成为千余年前中外文化交流和中日人民友谊的见证。

《秦王破阵乐》以其深厚的艺术魅力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赞誉，曾多次参加国际性艺术交流活动。近年来，“齐鲁乐团”、“陕西省歌舞剧院歌舞团”等艺术团体相继以崭新的风貌和艺术风格，创作和演出了大型器乐合奏曲《秦王破阵乐》和《唐·长安乐舞》（包括唐王朝时著名的《秦王破阵乐》、《春莺啭》、《龙池乐》、《霓裳羽衣舞》等舞蹈）。使其千余年前古代艺术重放异彩，不仅在国内演出突破千场，而且还出访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增进了中外了解和文化艺术交流，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

碑亭简介

卢 敏 吕魁隆

庄严肃穆的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碑亭位于临清市大众公园的中央；这座政治性强，艺术性高的仿古建筑物，是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和临清市人民政府，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人，于一九八九年拨出专款兴建的。从破土奠基到竣工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质量之好，是我市仿古建筑史上罕见的。

这座纪念性建筑物的主体部分由平台、碑、亭所构成，意即碑亭式建筑物。平台高0.6米，东南西北各设五层踏步，取烈士排行为五之意；平面尺寸为7.7米×7.7米，象征“七·七”事变，抗战开始。四周用泰山花岗石堆砌，碑座下与其周围用水泥沙浆构出金砖效果。纪念碑由碑座、碑身、碑帽三部分构成，全部选用稀有石料泰山黑（又名鱼籽黑）磨光，质地坚硬，价格昂贵，总高3.091米。其中碑身高1.891米，象征烈士生于1891年；厚

33公分，象征烈士生前所率33集团军将士为民族解放所作出的牺牲；宽93公分，象征九月三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碑身正面镌刻原国防部长张爱萍题词“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字迹流畅，加以烫金，更引人注目。背面镌刻着“张自忠将军碑铭”，章法得当，字体工整严谨，镌刻精细。碑座上镌刻缎带，表示对烈士的悼念，碑帽上镌刻青龙，示意为龙的传人。碑亭吸收了明清建筑的特点，柱间、柱距等尺度上继承了我国古建筑的传统手法，四根明柱及内外彩绘面，均为一麻三灰五油，柱梁坊檩所涂油漆，以红蓝绿为主，间以装饰各种图案花纹，较好地表现了明清以来的庄重画风，使纪念亭的思想性更加明朗，主题更加突出。纪念亭采用绿色琉璃瓦顶，上作琉璃雕花宝顶一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由地面至顶端总高为7.8米。

在纪念亭的配画设计中，既吸收了古建筑的传统手法，又进行了大胆革新，力图所选画面内容均配以恰当的画题，寓意深刻，颇具匠心。

正面画“芦沟晓月”，含意是中国当代重

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是从这里开始的，每当瞻仰的人们伫立亭前，便会联想起我国人民历经八年浴血奋战，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谱写出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画卷。

背面画“长城雄踞”，画面呈现出伟大的长城蜿蜒于崇山峻岭之巅，巍峨的城楼高矗，远景则为碧水蓝天，一派国泰民安的升平气象。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长城比喻为国家的安全屏障，它象征着将军曾在这里率领大刀队，重创敌军，大煞日寇的嚣张气焰。

外侧左右各画“苍松”、“翠竹”，象征将军精神，光照环宇，万代长青。

画栋内侧正面为国花“牡丹”，画题为“国色天香”，比喻将军是民族之魂，是民族的精英；对面为挺立的“荷花”，画题是“荷莲馨幽”，寓意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后，将军毅然驰骋沙场，战功显赫，将军精神象荷花那样散发着沁人肺腑的芳香，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两侧山水画，东有“蓬莱仙阁”，西有“峨眉群秀”，一为将军出生在祖国的海疆省份——山东；一为将军的忠骨长眠于峨眉群峰拱抱的山城重庆。顶内画梅兰竹

菊四君子画，皆借以烘托将军一生为人正直，品格高尚，很好地烘托了主体建筑。

整个碑亭建筑造型粗犷，高宽合理，绿瓦红柱，古色古香，庄重大方，色彩瑰丽，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使人观之能达到既轻松又肃穆的效果，在我市纪念性工程中，张自忠抗日烈士故里碑亭堪称一绝。

附：

- 1、张自忠将军碑亭照
- 2、张自忠将军碑铭照



(张自忠将军碑亭 殷黎明 摄影)

張自忠將軍傳

張自忠將軍，字靜江，號壯猷，湖南新化人。生於一八九一年，卒於一九四〇年。其父名慶，字子衡，系清末舉人，官至陝西布政使司參議。其母名蕙芳，系清末秀才張國璽之女。自忠幼時家境貧寒，但天性聰明，好學上進，十四歲即入私塾，十八歲考取秀才，二十歲考取舉人。一九一五年，自忠考取北洋軍校，畢業後被派往山西軍隊，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職。一九二四年，自忠調回南京，任軍委會秘書處少將參謀長。一九三七年底，自忠奉命率軍赴山西抗戰，先後擊退日軍數次，立下赫赫戰功。一九三八年，自忠率軍赴陝西抗戰，屢建奇功，被授予軍委會上將軍銜。一九三九年，自忠率軍赴山西抗戰，屢建奇功，被授予軍委會上將軍銜。一九四〇年，自忠率軍赴山西抗戰，屢建奇功，被授予軍委會上將軍銜。

悼念五表爷张自忠将军

诗 二 首

林 远

(一)

英名垂青史，
立碑故里荣。
三杯洁菊酒，
敬祭表亲翁。

(二)

奠慰先烈知，
报国志不移。
时代虽有变，
献身建国基。

忠烈一生 后人之师

——缅怀先烈张自忠将军

林 远

赤诚爱国心，
弃文投戎军。
岂忍山河碎，
喜峰初试刃。
鲁南挫敌焰，
豫鄂转战频。
报国早有志，
大勇始成仁。
不愧军魂称，
抗日第一人。
一生忠烈气，
永为后代循。

将 军 颂

薛 凌 贝

公园新亭英烈颂，

怀念自忠张将领。

爱国抗倭转南北，

为民奋战卒宜城。

国共两党称良将，

人民十亿尽光荣。

忠魂化为千秋业，

光照神州万年青。

王贵笙题画诗六首

侯朝宪

一

满庭修蔓筛风月， 四面重重布绿阴。
聊借一枝鸣得意， 正堪闲坐听春禽。

二

虬龙气势欲参天， 不与繁花共斗妍。
叹惜世间荆棘满， 为丛驱雀是鷹鹯。

三

松颠积雪夜沉沉， 何处飞鶴集泮林。
尔自独醒他自睡， 原来同类不同心。

四

薰心乍展绿成帷， 灿烂风光伴锦葵。
笑尔灵猫不捕鼠， 偷窥瓦雀欲何为。

五

东篱自被渊明赏， 不与千红万紫同。
此意无人能道破， 天教鸟说向西风。

六

一双鳴雀互争枝， 欲决雌雄坠地迟。

花纵无香终有色， 缘何杜甫不题诗。

即景漫成， 摹觚率尔， 贻笑大方矣。

作者简介：王贵笙（1876—1960）字晋廷。本市山集人。清末拔贡。入民国，从事师范教育二十余年。他诗文书法俱佳，而人品高尚尤为学生所敬重，一九三四年主编临清、清平县志。解放后，曾任清平县人民代表，山东省文史馆馆员。

诗简释：此六诗原题作于戊寅年，即一九三八年，日寇南侵，汉奸匪军盘踞临清之时。虽是题花鸟画之作，但实寓恨敌忧时深意。

第一首，一二句写当时环境之阴暗。“聊借一枝”，暗喻敌人一时盘踞；“鸣得意”讽刺敌人之骄态，且寓必败之意。自鸣得意者必骄纵，骄必败。

第二首，首句以苍松喻顶天立地于乱世而不屈不挠的人物，第三句伤时局之艰难。第四句讽刺敌人的暴行如鹰鹯为丛驱雀。

第三首，痛恨敌人之破坏学校。讽刺坏人怀阴谋。（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南侵，麻佛寺联中遭破坏。古时学校称泮林或泮宫）

第四首，以猫不捕鼠，偷窥瓦雀，讽刺国民党军队不抗日，害人民。

第五首，咏秋菊，赞陶渊明高节隐居，以遣怀。三四句讽刺某些人不理解乱世隐居之意义。

第六首，一二句讽刺匪军互争地盘，并预示其必两败俱伤。（退字应从反训。）第三句含意是：花香如人之品德；颜色如人之外表；无香有色之花不足贵，无品有表之人更可卑。第四句暗用苏东坡下诗典故。“东坡三载黄州住，何以无言赠李琦？亦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李琦是黄州名妓。由此可见王先生对无品败类卑视之甚。因一二句比喻明显，恐遭忌恨，故加跋语。

会通河史略

崔子良

会通河在临清历史上叫过北运河，也曾导引泰安汶水叫过汶河，当代临清都叫它小运河了。

临清城境内的会通河，始建于元朝世祖忽必烈年间，由著名水利家马之贞施工兴建的。征集民夫三万人，正月开工挖河，六月河成竣工。会通河由东平安民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至东昌（聊城），又西北至临清，全长250余华里。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对此河段亲自赐名为“会通河”。

元王朝建都北京，为维护封建统治，所需财政支出无不依赖于鱼米之乡江南。大批钱粮要靠漕运，开挖会通河就成了必然之举。于是，在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差奥鲁赤、刘都水去济州定开河夫役。时隔两年济州新开河成。然而，尚有东阿至临清一段需要陆运方可入运河转水运进京。货物的转运装卸费

工费时十分不便，于是才开挖了会通河。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一条从南到北的京杭漕运直航线全部完成，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这样比绕河南隋朝开凿的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且无陆运全是水运，减少了许多不便。随着后来航运事业的发展，就连东平安山之南的济洲河，也一并称会通河了。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决口，会通河被泥沙淤塞，漕运断航。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政治中心北移。为了沟通元朝开通的南北大运河，输送军用粮饷以巩固北部边防之所需，又重提再开会通河之议。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会通河进行了全面疏浚开挖，整个工程至到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才全部竣工。从此，运河船只又可以南经徐州入淮河驶达江、浙，北经卫运河直航京、津，成为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此后，明末及清代对会通河多次疏浚、维修，增建了一些闸、坝建筑物，利用这条河承上启下，航运事业得到大的发展。据《淮系年表》记载：明嘉靖年间整个航运粮船有三千余艘，至万历年间增到七千七

百余艘。

会通河的开挖和通航，临清地理位置成了航运线上的必经之地和咽喉要道。特别是明、清两代漕运的发展，对于繁荣临清经济，促进文化事业和城区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会通河通航时期，明、清两代每年从江南漕运的米粮有百万石，悉由此河输至京师，每岁船数十帮（俗称四十八帮），往返过境。不仅南北货物可以附载，而且达官富商亦皆取於此。据《临清县志》记载：“临清商业称盛一时者，藉助此河之力颇大。”围绕运河，会通河众多码头的建设，城市规模全面展开。当时的永清街为最大的粮市；车营街承担整个装卸运输业务；广积门外皮货及屠宰业颇为发达；中洲（城市中心）其间商贾云集，市肆星罗，为全城繁荣重心，商业最盛。这期间临清的地方特产远销全国。当时最富有盛名的有：砖，制造优良列为贡品；哈达生产在清代最为发达；床几、枕簟、帘箔、筐篮及一切竹器销路颇畅；柏木筒成为过往商船上的必购品；羔皮称贡皮；千张纸为临清“三宝”之一；酱瓜色味俱佳推销最远；龙须贡面以及棕櫚、糖饴、布鞋、枣脯等特

产，都是南北驰名、远销各地。当时，外来船只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致使临清热闹非凡，买卖兴隆。据《临清县志》记载：“当时商业勃兴而不可遏，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由此而知，会通河的开发和漕运事业的发展，使临清这块宝地，得以由小到大，南北驰名。它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有今天的临清风貌。

会通河在临清是从魏家湾入境，流经戴湾向西至城区鳌头矶以北，向西入运河。光城区就建有：鳌背、通济、会通、永济、月径、问津、宏济七座桥交通方便。后来明代陈瑄又开挖会通河南支河段，建起头闸、二闸，其水又改道由南支头闸口入运河。

在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开挖会通河南支河段时，将所挖河泥土堆积成山，后取名为“龙山”。龙山高约六、七丈，山上植树成荫，蔚然深秀。登山遥望东南阡陌纵横，村庄鳞次。俯瞰西北高塔耸峙，阑干栉比。每当夕阳西下暮烟十丈，夜晚万家灯火，一览尽收眼底。

位于临清会通河南北分流之间的鳌头矶，

始建于明景泰年间。据《临清县志》载“中洲(城中区)，东起处砌以石，如鳌头突出，筑观音阁于其上，新旧闸各二分左右如鳌足，而广济桥(竹杆巷西头的浮桥)尾其后，明知州马伦题曰：“鳌头矶”。邑人方元焕书之。当时通航盛时，登矶观赏过往船只，船帆如林，船工号子雄壮动听。

为保漕运，明、清两代为避黄河侵淤，对会通河整修疏浚最勤。一般每年一小浚，间岁一大浚。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航道淤塞。当时正值太平军兴起，清政府无暇修复运道，被迫改由海运。同治十一年命山东巡抚丁宝桢督挑运河。但因黄水灌入泥沙淤塞严重，难以疏通。漕运船只到临清南闸外有拖坝之险，且会通河水不足，每次启闸放船无几，水即消尽。故在入运河处筑一阻水坝，漕船到时用搅缆牵挽，利用坝上滑泥顺势拖过，然而，每次拖坝毁船颇多。及至漕船回空时，由低向上牵挽更难。所以，每年北运漕粮不过十万石，仅占全部漕运四十分之一。以后运道浅阻更严重了，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停止漕运。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奏准挑浚由临清至聊城一段会通河，工竣需银三万六千两。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山东省建设厅疏浚黄河北岸至临清之会通河。工竣，临清费银币十万余元。以后，会通河年久失修，水枯河淤，变为废壑。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1951年动工疏浚过由临清至张秋河段，整修纤道，平整狼窝，发展短途航运。终因上游水源断绝，1958年断航。目下河道尚存，不过，已成为遇涝排水，涝水西排入卫运河，东排入马颊河。是确保汛期城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十分重要的排涝河道工程。同时又是遇旱引黄引卫河水灌溉的骨干渠道，沿河两岸十余万亩良田，五谷丰登。

1988.3.1

党恩浩大 永志难忘

——1963年临清县抗洪纪实

郝修业

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当时属临清县的河西五个区，六十多万亩土地变成一片汪洋，水深一般在一米以上，平地行舟。如在旧社会，又会出现一个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大灾荒。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靠天，不求神，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日夜向洪水搏斗，并及时抢救和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终于战胜了洪水，使灾民安然度过了灾荒。当时全县党政军民在抗洪斗争中，为抢救人民群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动人情景，全县人民永志难忘。这一历史事实，理所当然地应纪录在临清人民的抗灾史册。

1963年8月初，由于河北省的邯郸、邢台地区，连续七昼夜降落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雨量集中而猛烈，持续时间又长，从8月2日到9日由南侵来，从东向西雨量逐渐增大；京

广路以西，降雨1350毫米，京广路东，滏阳河以西，降雨近700毫米；滏阳河东降雨都在300至400毫米之间，等于多年平均最大7日降雨量的8.4倍，致使冀南的太行山东麓径流猛增，山水暴发，奔腾直下，向漳河、卫运河、滏阳河、沙河等整个海河水系的各条河道和冀南平原倾泄。各河道洪峰暴涨，猛不及防，到处漫溢溃决。又加岳城水库因承受不了上游山水的压力而开闸放水，库水与山水径流汇合，汹涌咆哮，势不可挡，使邯郸、邢台地区变成一片泽国。

卫运河洪峰猛涨，8月6日临清段水位达到34米多，接近警戒水位，并仍在继续猛涨。县防汛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斗争。当日上堤民工达64000人左右，其中左岸34000人，右岸30000人，备土巡堤，日夜严防。11日7时，洪峰水位达到36.44的保证水位，并仍在继续猛涨。两岸险工段到处告急。卫运河在临清是地上河，当时的洪峰水位比临清地面还高四五米，等于在市民房顶上行洪，一旦堤岸溃决，用不了一个小时，洪水就

会将临清城区全部淹没，十几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付之东流。县委领导人感到问题严重，责任重大。未上堤的城区市民万分恐慌，日夜冒雨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往河堤上、土山上、高大建筑物上乱跑。真是人心慌慌、朝不保夕。县防汛指挥部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十一名县委常委，除留两名负责全面指挥外，其余九名常委都分赴两岸包堤段，包险工，具体指挥干群奋力抗洪，各段出现问题，就地解决，分秒不可贻误。水位距堤顶仅一米多，为了迎战急剧上涨的洪峰，县防汛指挥部决定领导民工在大堤上修子堰；铺底3米，高1米，封顶一米，层土层硪，确保质量。提出“水涨堤高，让河堤与洪峰赛跑”的口号。全体民工运土打堰，日夜不停，风雨不止。水位不停地上涨，子堰层层加高。正在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卫运河在上游决口，滔滔洪水奔腾呼啸，到处泛滥，平地水深一至两米，从邱县向东北席卷而来，8月12日进入临清县境。公路被冲断，桥涵被冲垮，电杆大部被冲倒，切断了通讯联系。下堡寺一带村庄，已被洪水包围，水头正在向东漫延。为了保卫河西各区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的安全，指挥部当机立断，确定兵分两路，让下堡寺、董村、吕塞三个区的民工从河堤上全部撤走；临河尖冢、老官寨两个区也抽去16000名民工，都跑步回村打护村堰、拦洪坝和堵街口，力争不让洪水进村。县防汛指挥部驻地，为避免洪水包围，也由河西农场迁到河东迎宾旅馆（现在的东风旅社）楼上。河水继续上涨，从邱县来的水铺天盖地向东漫延。卫运河左堤已陷于里外是水，腹背受敌。但左堤的防汛民工，却由原来30000多人，减少到10000多人。这时也确有少数干部认为：河西已经上水，有放弃西岸的思想，从而引起河西东部尚未见水村庄的群众严重恐慌。各村纷纷派代表到指挥部请求，他们掉着眼泪哭喊：“你们不能放弃河西，难道党不要我们了吗？”经再三解释，走了一起，又来了一起，整天迎送不暇。这时接到中央“坚决固守两岸”的重要指示，指挥部立即召开了党政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迅速传达，认真执行，进一步研究了固守两岸的具体措施，重新部署，继续作战。提出了“人在堤在，固守两岸”的战斗口号，从而增强了干部信心，提高

了群众斗志。到指挥部来请求的河西群众代表高兴地说：“中央的指示，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县防汛指挥部领导班子一分为二，由政委张镜湖继续负责防汛，由指挥赵仲升率领一批干部组成救灾指挥部，抢救河西灾民。来势迅猛的河西洪水面积继续扩大，水位逐渐增高，尤其在县境西北部清河县的东风渠未冲垮以前，因向东北去的洪水受阻，使临清境内水位迅速上涨，仅两天的时间，60多万亩丰收在望的粮棉作物，除少数高粱仅能看到上半截外，其余全被淹没。西自邱县、威县，南到馆陶，北到清河，在临清境内东西80华里宽全部是水，有246个村被水淹没。洪水进村后，房倒屋塌，下堡寺区的庄科村，除14间房没倒外，其余全部倒光。有的牲口在水里泡了两天两夜，光露着头，人们顾不上抢救。被水包围的群众，都在没倒的房上和树上日夜呼救。洪水在地下淌着，大雨在天上下着，他们的哭喊和呼救声全被雷声、流水声所淹没。县防汛指挥部由于没有船只和救生物资，人人焦急万分。在这最危机的紧要关头，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

来了一个营，并带有二十只橡皮船和救生圈等物资多种，是奉命专来临清支援救灾的。童村地势较高，村周围还没上水，县救灾指挥部确定在童村建立灾民接待站，作为灾区中心据点，用橡皮船到在水中的各村去抢救灾民。立即组织干部与解放军配合，带着橡皮船、救生圈、熟食等乘船往童村进发。到童村后，一分钟也不忍耽搁，他们一方面组织搭棚、找房给灾民准备食宿；一方面派解放军和县区干部乘橡皮船，分赴四面八方到各村去抢救水中的群众。时间紧迫，情况危急，抢救工作日夜在风雨中拼搏。当在房顶上、树上呼救的群众看到政府来船接他们时，好象长期被人欺侮的孩子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哇哇地大哭，连什么话也说不出。面对此情此景，船上的干部和解放军都淌着眼泪，一边劝慰灾民说：“别哭，别哭！我们这不是来了吗？”一边先让老人、妇女、病人和饿得直哭的孩子上船走，给年轻身体较强的人留下熟食，让他们第二批、第三批走。从水中接到童村的灾民越来越多，虽也及时向临清市区转运，但人多船少，转运不及，童村最多时到过三万人，把童村粮站的

储粮全吃光了。周围几十里全是水，外边粮食运不进去。正在危难之际，省委派飞机来向童村空投熟食，一天投三到四次，有大饼、馍馍、烧饼等。在水中饿了几天的灾民群众，捧起还热呼的空投熟食，感动直掉眼泪，他们不会用准确的词句表达感激党和政府的心情，只是一边吃，一边呜呜地哭。后来省又从青岛调来一批黑色木船，配合原有橡皮船，又从童村向临清市区转运灾民，由临清市区再转移到河东非灾区进行妥善安置。8月下旬，河西大水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县救灾指挥部把临清市区到童村的公路，从水里垫高修通，用各种车辆运人运粮，终于使河西五个区十几万灾民全部脱险。最后统计：淹地成灾（绝产）57万亩，倒塌房屋93282间，死49人，伤301人，牲畜死153头，伤155头。

尽管卫运河上游决口，河西全部上水，但临清段的卫运河水仍在高速暴涨，到8月14日6时，水位达到37.42米的争取水位；16日1时，水位达到37.84米，超过保证水位1.4米。流量增到2530秒立方，超过保证流量1250秒立方米的一倍还多，远远超过大堤的承受力，有22680

米堤段（占大堤总长度的30.9%）水位超过大堤顶0.3米，全靠堤顶上子堰挡水。有50805米（占大堤总长度的69.1%）水位接近堤顶，随时有漫溢的危险。先锋大桥下的水位，距桥面不到半米。临港码头货场全部被淹没。由于水位高，压力大，两岸大堤承受不住，以致各种险情到处出现：严重浸提出水堤段长达32006米，占大堤总长度的44%，大堤脱坡13处，险工坍塌15处，隐患15处，透水漏洞20处，涵洞出水6处，大堤裂缝39处，出现大险、重险8处，即大桥砌石坡下塌，先锋大桥两头桥台下沉，头闸口闸门窜水，万家嘴砖坝下塌，三元阁砖砌坝窜水，孟庄闸板出槽，东白塔窑临河大堤坍塌，天心桥砖缝出水，张家窑北在暴风雨中出现隐患漏洞。这一切险情，都威胁着临清人民的生命，揪着每个领导人的心。县防汛指挥部再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从党内领导干部做起，号召党、团员要紧急动员起来，带头抗洪，接受特大洪水的考验。充分发挥155个临时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当务之急，就是对堤上子堰加高加厚，避免漫溢出险。两岸民工车拉、筐抬，日夜不息，跑步

往堤上运土筑子堰；铺底5米，高1.5米，封顶宽2米。有的堤段用牲畜往堤上运土，沿河各村妇女、小孩都自动参加运土，几万人一个共同心愿，累死也不能让大堤决口！抢险队发挥了战斗作用，县防汛指挥部紧急组成县、区、社、队四级抢险队，县级抢险队共200人，每25人为一抢险小队，共8个小队。另外还有来支援的黄河工程队三个小队，在县防指的领导下，哪里出现险情，就到哪里紧急排险。他们不仅有熟练的排险技能，并有高度的纪律性，真正是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坚强集体。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副书记周海舟亲来临清指挥抗洪斗争，并深入沿河两岸，哪里出险，就到哪里去。在紧张的排险战斗中，各个险工到处都需要大量草袋、麻袋、木桩等防汛料物，但因用量太大，一时不能满足抢险需要。朱永顺书记驱车回到县防汛指挥部，他象前沿阵地的指挥员一样，抓起电话就喊：“我是地委书记朱永顺，要省委书记谭启龙！”电话很快接通后，他对着话筒喊：“我是朱永顺，临清防汛吃紧，三元阁等处到处出险，情况十分紧急，要赶快支援临清！”谭启

龙书记回答：“你们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何时要何时给。”哗啦哗啦话筒里传来对方展放图纸的声音。“这里，这里，三元阁，三元阁！”对方电话机旁的谈话声听得一清二楚。朱永顺书记拿着话筒大声喊：“赶快送十万个草袋来，十万个！越快越好！”夜间打的电话，没到天亮，满载草袋的汽车队就源源而来。接着省委又派飞机向临清大量空投草袋、麻袋、铁丝等防洪物料（投放地点在临清北门外）。在这到处出险，两岸告急的关键时刻，上海驻军东海舰队一个小分队，带着两艘汽艇和救生圈等物，从德州逆流而上，专来临清支援抗洪斗争的，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到哪里去，对临清抗洪斗争起了重大作用。在洪水严峻的考验中，临清各有关部门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职能作用：电业局在两岸70多公里的大堤上，全部拉上线，安上灯，并保证风雨阴晴日夜供电；邮电部门不仅保证电话、电报分秒不误，畅通无阻，并派专业队冒雨到堤上安装电话，哪里有险工，就把电话机安在哪里，使领导人对各段险情了如指掌，及时采取措施指挥战斗；交通部门组织了143部汽车，在河

堤上来往飞驰，日夜抢送抗洪料物。党政干群和广大职工、教师等共七万五千多人，连续奋战了七昼夜，终于战胜了洪水。从8月16日16时，卫运河水位开始下降，到8月30日河水才全部归槽。在抗洪斗争中，打子堰、戗堤等，共完成土方25万立方米。

洪水给海河流域人民带来严重灾害，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为河北省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是“一定要根治海河”。卫运河列入根治规划，1972年进行扩大治理，保证流量4000秒立方米，比建国初期提高了十倍。1963年到1981年未见大汛，1982年汛期卫运河水的流量达到1200秒立方米，但由于进行了扩大治理，洪水局部漫坡，仅短时间淹河坡地35000亩，未成大灾。

垂 钓 小 史

崔 子 良

临清人乐于垂钓，而且善于在湍湍急流的河水中钓鱼。这种独特的垂钓技能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临清历史上城东有马颊河，城西有南北大运河，城境环绕会通河（俗称小运河）而建设。这优越的自然水域环境，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为钓鱼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垂钓天地。

元朝世祖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挖会通河。至明、清两个朝代，临清成为南北大运河航运线上的必经之地。北来的船只要在临清这个地方，需取道会通河才能南下。南来的船只北上要由会通河转渡运河方能北上。明朝嘉靖年间整个航运粮船有三千余艘，至万历年间增至到七千七百余艘。临清地处咽喉要道，码头众多，帆船林立，每天转渡的过往船有四、五百只之多。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临清，转渡

之时闲暇无事，外来客商举杆垂钓于运河、会通河岸边，或垂钓于船头，频频鱼儿上钩，招引了许多好奇的人们观看。河水垂钓技法就渊源在临清这个地方流传下来了。

临清多河水，河水乃动水，在垂钓方法上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用五米长杆、粗线、大钩，以小青蛙、榆树红虫子用细绳捆在钩上作诱饵，抓住一早一晚时机，在流水湍急的砖石坝边，顺水移动鱼杆点钓鲶鱼，颇有收获。

二是，用丈余细竹杆、细线、针钩，以苍蝇、面食为诱饵。使用悬漂，垂钓白条鱼（本地叫“窜条”）颇有乐趣。

三是，用竹杆、粗线、重坠、中型鱼钩，以蚯蚓、面食为诱饵，垂钓鲫鱼、鲤鱼、鲶鱼等。

历史上每年的夏秋季节，常在鳌头矶处，运河东岸、会通河两岸、三元阁和浮桥口码头处，集聚垂钓者。不过，旧社会穷人多，劳苦大众忙以谋生，很少有人垂钓。钓鱼者多系富商和官宦子弟所为。

活水垂钓有它的独到之处，钓鱼活动兼有

“尝画的绚丽，吟诗的飘逸，弈棋的睿智，览游的旷达。”这种精神上的乐趣，只有饱尝垂钓奥妙的人们才能领略到的。

临清解放后，人民政府忙于政治和经济建设，在干部群众中不提倡钓鱼。因此，在人们思想上一直把这项有意义的体育活动，视为不务正业的人所为，长时间很少有人问津。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从事国家建设的干部，工人有的年事已高，退休、离休安度晚年。可是，在家闲着没事干，不免心理上产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临清市委、市政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从关怀爱护老干部、老工人们的晚年生活过的幸福愉快出发，于一九八八年以“老协”的名誉，组织起来市钓鱼协会，有靳增惠、高月波、白金生等几位老同志出面领导，确定垂钓场地。第一年就有近百名老同志参加到协会中来。是年以市老协、体委、工会、钓鱼协会联合组织，主办了首届老年人“康乐杯”钓鱼比赛。六十多名爱好者参加垂钓，很受鼓舞，有效地推动了老年人体育活动。有位老干部深有体会地说：每天钓上几个小时的鱼，心情上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垂

钓在郊外活动，空气新鲜，阳光明媚，使人流连忘返。这项活动高尚清雅，有动有静，动静相宜，是老年人修身养性，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理想的运动形式。“一竿在手，其乐无穷。”钓鱼活动的开展，深得老干部的欢心，晚年生活有新的乐趣。

临清竹器业的演变

二轻史志办

竹器的使用，历史很久远了。“尚书‘禹贡篇’”里记载的“筐”就是竹编的筐子。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竹木手工业有了飞跃发展，“周礼”“考工记”里记有竹席、竹笥一类的东西，把竹杆劈成细薄的篾编席，就具有相当技术了，临清竹器技艺是明代由江南传来。明永乐以后卫运河两河合流而过，这里成为京畿咽喉重镇。为了鼓励漕运，嘉靖年间曾明令规定：每条漕船准许携带货物二成，自由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货物往来贸易。江南的竹料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竹器行业也就相继形成。明万历末年领导反税监马堂的王朝佐，就是编筐匠人。（有传）临清夹运河，傍卫河有两条竹器街道。

一是油篓巷。“巷内人家俱以篓为业，编竹成之，内糊油纸甚轻，客装油必用之，唯临

清者（指油篓）鼠不啮。”（乾隆十四年王浚“临清直隶州志”）。独有临清的油篓老鼠不啃，这是产品的特点。在公元1749年以前，油篓就成了名牌产品。油篓大小不等，不仅装油、而且可以装酒、装醋，酱园用小篓包装豆腐乳、臭豆腐、八宝豆豉、什锦小菜。油篓长方形，类似扁瓶状；用厚薄均匀的竹篾编织而成。篓内用桐油浸透的油纸和拌料油，一层一层地刷糊，晾干后坚硬而轻，历史上是很理想的包装容器，销自沿河城市和附近诸县。清末由于铁皮容器的应用，此业渐衰。民初，剩下四五家迁至竹杆巷，在竹器行业里还保留了这个产品。

二是，竹杆巷与油篓巷隔河（现在的死河子）相望，巷内有两大竹商和七十余户制造竹器的手工业者。产品有百余种：农器类有：竹筢、扫帚、筛子、竹算、鞭条等；日用器俱有：风门、竹帘、篮子、筐子、篓子、竹几、竹椅、竹担、竹杠、筷子、竹针、竹牌、绳刷、缸帽、童车；玩具类有：花车、哨哨、鸟花等。他们的生产工具很简单，全靠手艺争市场。有个歌谣：“一把篾刀一弓锯，两把竹篾做生意。”都是小本经营。从明代就靠竹商供应原料。清代，巷内有“亨

通”“太和”两店号兼营竹木，他们从浙江清华贩来竹料以高价售给手工业者。同时，他们也雇佣工人自己出产品，在市场上与小本经营的手工业抗争，因此，许多户全家劳动，仍是干一年穷一年，无所发展。公元1931年竹杆巷大火，火自“亨通号”引起，烧了三十多家，使百分之五十的竹器手工业者破产。日伪统治时期，交通梗塞，这个行业已濒临绝境，由原来的七十户，仅剩下三十余户。1945年临清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手工业采取了积极扶持发展的政策，1949年成立了供销生产社，凑钱买料，按钱分货，加上银行大力扶持，解决了原料供应的困难。常年有人住在浙、闽、赣采购毛竹、竹苗，购来的原料价格比买竹商的便宜三分之一。1950年竹器行业已经发展到八十七户，从业人员二百八十七人。1952年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集中生产小组。1953年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有二十六名手工业者首先成立了高级形式的生产合作社。1954年，一条竹杆巷从东到西一派兴旺景象，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这里拍摄了“临清竹器行业合作化”的记录片，向全国介绍了由初级的供

销生产过渡到高级生产社的情况。1955年，又成立了第二竹器生产社，两社共有社员一百七十三人，占全行业总人数的61.8%。1956年全行业实现了合作化，社内总人数三百九十人（包括学员）集中生产。1956年总产值达到六十六万四千元，比一九五四年的三十二万四千九百三十四元增长了一倍多。产品销本省的十三个县，占总销售额的50%；销邻省的七十个县，占40%；销东北等省的占10%。从1953年销东北筛子一万个开始，与贸易公司有了业务联系；1954年销到天津帘子六千挂，也与那里建立了联系；1955年，竹帘子又有省供销社包销75%，当年的下半年改为自营。1958年，在“大跃进”中，两个社合而为一个合作工厂，吃上了“大锅饭”（即不按劳取酬，到月拿工资）。这一年既是竹器行组织发展的一年，也是日趋衰落的转折点。其一，组织形式过于集中，失去了灵活多变的特点；其二，“吃大锅饭”盲目生产、产品大量积压；其三，仅图于向生产机械化方面发展，也搞了“起篾机”、“编暖瓶套机”、“劈竹机”，但产品还是四十年代老、粗、笨、壮的样子，没向装饰化、

工艺美术化方面发展，老产品自然被淘汰；其四，七十年代塑料行业的兴起，取代了大部分竹器产品。由于这四方面的原因，竹器生产一年不如一年。1976年，竹器只有十三人生产，不到十个品种，因此，转产改为五金工具厂。1984年，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关闭了这个资不抵债的小厂，工人们又重新组织了小集体，分布在各街道，根据市场需要生产竹器产品。

知识小品十则

修东海 编

(一) 中国的别称

九州——相传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

神州——《中华大字典》载：“神州，中国之别称。始于战国后。”

赤县——《谷梁恒五年》载：“九州之内名曰赤县。”

华夏——《左传·鲁定公十年》：“夷不乱华。夏原为国号，华原为国名，后称华夏为中国。”

(二) 我国新时期的统战对象

我国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大致有十个方面：

- 1、民主党派；
- 2、无党派知名人士；
- 3、非党知识分子干部；

- 4、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
- 5、原工商业者；
- 6、少数民族人士；
- 7、宗教爱国人士；
- 8、去台人员留在大陆的家属和亲友；
- 9、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
- 10、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

（三）我国现有的民主党派

- 1、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主要由国民党中的爱国民主分子组成；
- 2、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要由文教知识分子组成；
- 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要成员为工商业者；
- 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主要成员为中、小学教师及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
- 5、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主要成员是医药卫生界及文教界的知识分子；

- 6、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主要成员是华侨及侨眷；
- 7、九三学社（简称九三），成员是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
- 8、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成员主要是在大陆的台湾省籍人士。

（四）我国古代交友称谓

至交：深厚的友谊，亦指友谊最深，不猜不疑的朋友。

世交：亦称世谊、世好。泛指两家世代有交情。

八拜之交：旧时称结拜的兄弟、姊妹之交。

竹马之交：幼年相交的朋友。

忘年之交：年岁差别大、行辈不同而交情深厚的朋友。

刎颈之交：同生共死的朋友。

莫逆之交：彼此情投意合的朋友。

忘形之交：不拘身份、形迹的缺乏或丑陋，结成不分彼此的朋友。

市道之交：以做买卖的手段结交的朋友。

罔其重利忘义，后称“小人之交”。

点头之交：交谊不深，仅见面打招呼的朋友，亦称“一面之交”。

贫贱之交：生活贫苦，社会地位极低，而相交的朋友。

酒肉之交：专讲吃喝而结交的朋友。

患难之交：在逆境中结交的朋友。如果是夫妻称为“患难夫妻”。

布衣之交：普通老百姓相交的朋友。

君子之交：指道义之交，即在道义上相互支持的朋友。

（五）何谓“三教九流”？

在旧中国的社会中，根据地位和职业把人分了等级，即所谓“三教九流”（有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三教九流”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三教是：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各有不同的主张。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道教主张“金、木、水、火、土”；佛教主张“生、老、病、死、苦”）。

九流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

上九流：一流佛祖二流天，三流皇上四流官，五流阁老六宰相，七进八举九解元（进是进士，举是举人）。

中九流：一流秀才二流医，三流丹青四流皮，五流弹唱六流金，七僧八道九琴棋（丹青指画家，皮指皮影，金指卜卦算命之人）。

下九流：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高台指唱戏，吹指吹鼓手，推指剃头，修指修脚，配指配种）。

（六）公元·世纪·年代

“公元”是公历的纪元。它原是以耶稣基督诞生那一年作为公元元年，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逐渐成为基督教国家运用的纪元，所以也叫“基督纪元”，后来被多数国家所公用，于是就改称“公元”。在史书上，耶稣诞生前的年代，被称为“公元前”。

“世纪”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思是一

百年。也是从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公元元年至100年为一世纪，101年至200年为二世纪。依此类推，现在是二十世纪，2001年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

“年代”是指一个世纪中的某一个十年。如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指从1980年开始的那十年。从1990年起，就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

(七) 公历日历趣谈

任何一个世纪的第一天都不会是星期三、星期五或星期日。

只要不是闰年，一月一日是星期几，十月一日也一定是星期几。四月一日同七月一日、九月一日同十二月一日也同样如此。

每隔28年，日历中的月、日便会同星期的日子重合一次。就是说今年的日历再过28年还可重新使用。

(八) 扑克与历法

扑克是玩具，历法是一门科学，它们会有什么关系呢？请看下面几个数字。

扑克共有五十四张牌，其中五十二张正牌，表示一年中有五十二个星期日。

扑克有黑桃、红桃（又称杏）、方块、梅花四种花色，表示一年中的春、夏、秋、冬四季。

扑克中每种花色有十三张牌，表示一年中每季有十三个星期日。

扑克中每种花色有九十一点，四种花色共三百六十四点，如加上副牌小王（又称小鬼）一点，就是三百六十五点，表示历法中平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如再加上大王一点，就是三百六十六点，表示历法中闰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还有人说扑克中的副牌大、小王，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这也不无道理。

（九）有关“书”的知识

开本：开本指书刊幅面的规格大小，即一张全开的印刷用纸裁切成多少页。常见的有三十二开（一般书籍）、十六开（杂志类）、六十四开（字典、连环画类）。

版式：即书籍的规格式样，包括开本、排式、版面、插图等。

版本：指某种书不同的本子。有的书一出版就有几种形式，有的书在出版后，由于进行修改，再印时改变了原来的版本。

版次：第一次出版印刷的写有“某年某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这叫初版；如内容不变动，第二次印刷就注明第一版第二次印刷，这种书叫重印书。如第三次印刷发行时内容经过重大修改，版次就要重新算，要称为：“第二版第三次印刷”。

版权：即版本的所有权，印于书籍正文前后或封底。其他出版社不可随便翻印。

字数：不管书中标题有多大，插图有多少，都按横格字数×每页行数×总页数求出全书字数。若全页是照片或插图，则不数字数。

印张：它说明印这本书需要多少张纸。因为一张纸可以两面印，所以两个印张才算一个全张。一令纸是五百张，一千印张就是一令纸。

印数：指一种书所印的累计数。如果某种书在第三次印刷时，印数为“27,000—47,000”，即表明第二次已印过27,000册，这次是从27,000册算起，又印了两万册，累计数

为47,000册。

(十) 书号是怎样编的?

每本图书的封底，除了标明定价之外，还标有书号，即全国图书统一编号。书号包括分类号、代号和序号三个部分。分类号是图书的分类号，目前全国实行的图书统一编号方案，共分十七类，计：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哲学；3、政治；4、经济；5、军事；6、法律；7、文化教育；8、艺术；9、语言文字；10、文学；11、历史；12、地理；13、自然科学；14、医药卫生；15、工业技术；16、农业技术；17、综合参考。代号是每个出版社的代号。如某出版社的代号是090，序号是每个出版社每类图书的序号。例如《成语典故》书号是7090·113，“7”是文化教育类书号，“113”是某出版社的文化教育类图书的序号。

文 物 选 萃

殷 黎 明



唐代石造像

唐代石造像

山东省临清市博物馆在该市文物普查中在刘垓子镇梁庄村，发现一尊汉白玉石观音造像。造像呈站立式。通高79，肩宽23。宝座直径26，高13·5厘米，头部与躯体可分离，颈部有卯榫联接，无冠，头发卷曲似乳钉状，造像面型宽而短，下颏丰圆饱满。通肩广袖长服，不露臂乳，体态修长。雕刻形式为浮雕圆弧形线刻，褶叠式衣纹，技法流畅娴熟，特别是衣褶线条的处理，取阴刻垂直线纹。随体形而变化，富有薄柔的质感，显露出躯体轮廓。宝座系圆形仰莲座，由八枚仰莲瓣组成，基座呈圈足形，无纹样装饰，造像赤足而肃立于宝座之上，双臂下垂弯曲而双手稍残。

无文字纪年。

此造像是最近出土于离地表2米左右之地下耕土内。在出土土地东侧百米处发现一古建筑遗址，从发现的瓷陶片判断，结合当地群众反映，应为唐代寺庙建筑，此造像当为其寺庙遗物，它的出土对于研究佛教在临清的传播历史及佛教文化，都有一定的价值。

殷黎明



宋 代 瓷 罐

宋 代 瓷 罐

此罐通高22厘米，口径15厘米，最大腹径24厘米，足径9厘米，施白中闪黄釉，腹下抹使釉，假圈足，器内壁施灰褐色釉。罐的中部用铁红色色带绘以一周，将罐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叶状图案，下部为羽状纹饰，以铁锈及桔红两种颜色配合使用，古朴典雅，线条流畅习练，一气呵成，整体造型新颖美观，下部造型呈豆柄状，独具特色使人感受到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

此罐当属宋代瓷州窑系列产品。

殷黎明



宋 代 梅 瓶

宋 代 梅 瓶

宋代梅瓶，此瓶小口，短颈、丰肩瘦体，通高34厘米，最大口径15厘米，平底微凹，口沿剖面呈三角形，通体施乳白色釉，釉上用黑褐色颜料绘以图画，瓶体自颈至底部有五道粗细协调的带纹，其间分别绘以荷花、草卉、梅鹿、鸣鸟。线状图案其线条古朴稚拙，流畅明快，白底黑花，亭亭玉立，观之耐人玩味。

此瓶当是宋代瓷州窑系作品。

殷黎明



唐 代 瓷 壶

唐 代 瓷 壶

唐代白瓷壶，瓷壶通高20厘米，口径6·5厘米，最大腹径10厘米，底径6厘米，圆唇、高颈、鼓腹、平底有对称两系、带把、流短小、芒口，底部无釉，釉质细腻，釉色白中闪黄，并有细开片，胎质灰白。

此壶是1987年冬季在取土时发现的。

殷 黎 明